

漢學與史學的相生相剋 ——太平洋戰爭前的洪業及其未竟的學術藍圖

林 磊*

引言

1934年7月，胡適在《獨立評論》發表了題為〈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的文章，稱道燕京大學的中國文史研究足為教會大學之標竿，特別是得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Charles M. Hall, 1863–1914)遺產基金的資助並與哈佛大學合作後，更是「漸漸成為中國文史研究的一個中心」。¹換句話說，大有與北大、清華分庭抗禮之勢。身為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言談間不免要給國立院校留有餘地；向來直言快語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則沒有這方面的顧慮。他在1933年來華考察時，論人推崇王國維、陳垣，論機構則贊譽史語所、燕京和輔仁，好像完全不把當時的北大、清華放在眼中。²三十年代的燕京大學在中外學人心目中的位置，於此可見一斑。畢業於燕大歷史學系的周一良在回憶早年求學生涯時指出，「就文史哲三系而言，燕京顯然是教會大學的首腦，而這首腦的中樞，是洪煨蓮先生」。³燕京大學建校八十周年之際，由燕大校友會發起編撰的《燕京大學史稿》在述及歷史系的辦學成就時，也特別強調「洪業(號煨蓮)在任教授和系主任期間以極大的魄力扭轉了前期重西洋歷史、重西方教師的辦系方向，運用他的學識經驗以及國外著名大學培養的閱歷與眼

本修訂稿承蒙兩位評審專家惠示寶貴意見，特致謝忱。本研究曾獲復旦大學研究生科研項目的資助，編號：IAH6281420/019。

* 林磊，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20屆博士

¹ 胡適：〈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獨立評論》第108期(1934年7月8日)，頁5。

²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9。

³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36。

光，瞄準世界第一流大學的目標，為燕大歷史系規劃出了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歷史、重點發展漢學研究、中西歷史兼顧的新方向」。⁴

洪業要以科學方法在燕京大學打造國際一流的中國人文學研究中心的規劃，不曾因為日本侵華的兵鋒逼近而稍有改色。畢業於燕大歷史學系的王鍾翰終生難忘「一二·九運動」後，洪業在史學方法課上拍案而起的一席憤慨之言：

同學們，現在日本人侵略我們，國家已危在旦夕了。我們打不過人家，怎麼辦？有本領的，可以拿起槍杆子去和日本人幹，可是我們讀書人沒有這個本領，我們就不和日本人幹了嗎？讀書人也應有自己的本領，那就是我們要用筆杆子和日本人一爭高下！日本人狂得很，他們說，世界漢學中心從來就不在中國，先是在英國，後來在法國，現在是在日本。他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能力，我們一定要爭口氣，把漢學中心搶回我們北京來。⁵

1937年7月28日，日軍佔領北平，洪業以燕大文科研究所主任的身份，協助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安定大局，使燕大能正常招生、如期開學。1939年，洪業出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北平辦事處執行幹事，負責監管和協調六所接受哈燕社資助的教會大學的中國文史教學與科研工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洪業於此四年零五個月中的學科建設工作，在其晚年的口述歷史中鮮有提及，洪門弟子的回憶也更偏重這一時期的政治遭遇和生活境況。直到近年研究民國中美教育合作史的學者對哈燕社檔案加以發掘利用，才為我們勾勒出戰時燕大中國人文學建設內憂外患、腹背受敵的輪廓。⁶本文擬在此基礎上，補充北京大學檔案館藏「燕京大學檔案」及哈燕社首任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 1889–1975)俄文日記與書信中披露的相關細

⁴ 張瑋英、王百強、錢辛波主編：《燕京大學史稿》(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103。

⁵ 王鍾翰著、諸同學整理：《王鍾翰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9。

⁶ 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栾明香校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此書為樊書華英文著作之中譯：Shuhua Fan,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Cultural Engineering: Remaking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1924–1951*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節，⁷系統梳理洪業在抗戰全面爆發、北平淪陷的環境中逆勢而為，為打造國際一流的中國人文學研究中心作出的不懈努力和膽擘畫，並從法國漢學理念與中國新史學實踐的錯綜關係著眼，理解其終歸於失敗的原因。

一、洪業模式

據陳毓賢《洪業傳》，「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軍機轟炸北平西郊軍營時」，洪業正專心撰寫〈春秋經傳引得序〉的寫作。⁸這篇近十萬言的長序，系統梳理古今中外學者有關《春秋》及其三傳源流的論辯觀點，在日本學者飯島忠夫和新城新藏「曆算證史」的基礎上，利用近代天文學家對歷史上日蝕發生時間的推算結果，進一步證明《春秋》是實錄而非杜撰，並考證《左傳》、《春秋》、《國語》之關係和《左傳》成書年代等。⁹這篇春秋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發表於1937年12月出版的燕大歷史學會會刊《史學年報》的第二卷第四期。這也是北平淪陷後最早出刊的專業歷史學報。不少學者認為，洪業的〈春秋經傳引得序〉比他先前獲得法國漢學儒蓮獎(Prix Stanislas-Julien)的〈禮記引得序〉更為優異，¹⁰是其畢生講求的中西參合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的體現。¹¹這種方法曾為他贏得以挑剔尖刻著稱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青睞和友誼。正是由於伯希和的推薦，法蘭西學院(Institut de France)金石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才將1937年度的儒蓮獎授予洪業。¹²該獎由譯注《大唐西域記》的法國著名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A. Julien, 1797-1873)生前捐資設立，用於表彰年度中國學研究(實際包含整個東亞學範圍)最有貢獻之著作。在洪業之前，經伯氏提名、獲此殊榮的中國學術機構和學人，還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語言學家王靜如。史語所因李濟領導的安陽殷墟發掘及其高水平的考古報告而獲得1932

⁷ 本文引用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均據閻國棟著〈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載朱政惠、崔丕主編：《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頁514-28。

⁸ 陳毓賢：《洪業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98。

⁹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23-89。

¹⁰ 詳陳毓賢：《洪業傳》，頁198；劉子健：〈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歷史月刊》第17期(1989年)，頁78。

¹¹ 王鍾翰、翁獨健、劉子健：〈洪煨蓮先生傳略〉，載王鍾翰著：《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466。

¹² 陳毓賢：《洪業傳》，頁168。

年度的儒蓮獎，王靜如因開中國學界以比較語言學方法研治西夏文之先河，而獲得1936年度的儒蓮獎。¹³洪業之被提名，不僅因為〈禮記引得序〉解決了兩千年來有關禮在中國歷代經典和非經典文獻記載中爭論不休的疑難問題，更在於他從1930年開始主持的燕大引得(index)編纂項目本身，為以現代方法部勒浩如烟海的中國傳統典籍，尤其是母語並非中文的西方漢學界提供了最便利和科學的檢索工具。就此意義而言，伯希和之先後提名史語所、王靜如和洪業為儒蓮獎候選人，並非出於偶然或純粹的個人交誼。正像在他們之前獲獎的日本學者小野藤太(《仏和大辞典》，1906年)、關野貞(《朝鮮古蹟図譜》，1917年)和高楠順次郎(《大正新脩大藏經》，1929年)一樣，史語所、王靜如和洪業的工作分別代表了作為法國漢學體系核心的考古、語言和歷史文獻學研究，他們的成果既體現了法國漢學所標舉的新眼光和新方法，也為法國漢學輸送了新材料和新工具。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正是法國漢學在中國史學界如日中天的時期。以傅斯年和史語所為代表的新派史學陣營將伯希和及其史學方法奉為「巴黎學派正統」和「國際漢學祭酒」，¹⁴以史料學和語言學的建設為科學化史學的不二途徑。不過，正如巴黎學派內部早有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指出史語學派考證有餘而解釋不足。¹⁵奧地利漢學家查赫(Erwin von Zach, 1872–1942)也暗諷「伯希和缺少綜合能力和創造精神，只滿足於自己過人的記憶力」。¹⁶連伯氏最親近的弟子都認為這位漢學大師不具備歷史學家的基本素質——區分問題的重要與否，在閱讀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的多卷本《中華帝國史》時，只注意到作者在重建外國人名時的錯誤，卻看不出福氏駕馭大規模歷史綜論的優長。¹⁷換句話說，伯希和主觀上不想、客觀上也不具備寫作綜合性

¹³ 陳鴻舜：〈法國銘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之茹理安獎金(Prix Stanislas Julien)〉，《燕京學報》第23期(1938年)，頁292–312。

¹⁴ 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報》，1933年1月15日。轉引自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10。又參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並見於《大公報(天津)》，1935年2月19、21日第4版。

¹⁵ 楊堃：〈葛蘭言研究導論〉，《社會學與民俗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頁113。

¹⁶ 菲利普·弗朗德蘭著、一梧譯：《伯希和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73。

¹⁷ 丹尼斯·塞諾著、羅新譯：〈懷念伯希和(1878–1945)〉，載丹尼斯·塞諾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

論著的能力。同樣，在中國的新史學陣營中也有人質疑史料功夫和語文能力是否就等於史學的全部。從1929年開始執掌清華大學歷史系的蔣廷黻(1895–1965)就認為，中國的史家就分析能力而言——如考據校勘——確有能與西洋史家比擬之人，但在綜合能力方面與西洋史家相比，尚處在「前達爾文」(Pre Darwinian)，甚至「前培根」(Pre Baconian)時代，「簡直是幼稚極了」。¹⁸只在史料考據和文本校勘方面有成績的史學，生產出一張張定格的幻燈片，可以讓人知道歷朝歷代的各種史實，但某一朝代究竟在中國歷史的全程中佔據甚麼特殊位置，則要在幻燈片的基礎上綜合出活動的電影畫面才能看得清楚。¹⁹故而，蔣廷黻特別強調西洋史的學習，要學生先把西史名家的觀點、方法、洞察力學到手，再致力於分析綜合中國歷史上的大課題。同時，蔣廷黻認為治史必須兼通基本的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科學有助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和整體性。為此，他特地把當時國內對歐洲中古史和宗教史深有研究的雷海宗請回母校，以文化形態史觀為「中國通史」這門基礎課程建樹宏觀理論架構。據何炳棣回憶，「30年代的清華歷史系絕不是以陳寅恪為核心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受陳寅恪的影響，「學生大都了解考證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在蔣廷黻和雷海宗的啓發下，學生也對考證方法之外的社會科學方法，歷史分析之上的歷史綜合工作，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和好奇心。²⁰事實上，被何炳棣塑造成考證學派代表的陳寅恪，也並非考證之外更無史學。正如《吳宓日記》所揭示，陳寅恪的治學興趣自始即偏向史學。他的史學之路又正如蔣廷黻提倡的那樣，是從閱讀劍橋史系列也即接觸更強調綜合匯通的西方史學主流開始的。學習並研究中亞古代語言，只為獲取消史的必要工具，目的不在語言本身。²¹1932年後的陳寅恪已經很少發表有關「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論文；²²1934年後，更不再

[上接頁144]

年)，頁406–7、413。中譯本據英文原著：Denis Sinor,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 3 (Jul.–Sep. 1999): 467–72。

¹⁸ 蔣廷黻：〈歷史學系的概況〉，《清華周刊》第35卷第11/12期(1931年)，頁51。

¹⁹ 詳參蔣廷黻：〈歷史學系〉，《清華暑期周刊》1932年第2/3期，頁17–18。

²⁰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67–68。

²¹ 詳參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頁454–56。

²² 余英時分陳寅恪史學為三變，第一變曰「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詳參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頁457–60。陳寅恪的著作目錄，參蔣天樞：〈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載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訂本)，頁191–203。

開設相關課程，²³而將教研重心轉向「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²⁴他在魏晉隋唐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工具，在在顯示出對歐洲史具有相當深度的認識。他致力於為中古中國「畫出一整體新圖像」的努力，²⁵也證明他的史學抱負絕非盡在細節考證。1935年，陳寅恪在為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作的序中指出，以殘缺寡少之材料做奇詭悠謬之解釋者固然不是史學，但能依據文句個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者同樣不是史學。惟有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俱極具功力者，方稱得上是史學。²⁶雖然針砭的是清代的經學和晚近的古史研究，卻同樣適用於材料零碎、語文隔閡的塞表殊族之學，可被視為陳寅恪告別伯希和回歸史學的宣言。

清華歷史系的這種中國史與外國史並重、史學與社會科學並重、分析與綜合並重的教研方針，在擁抱伯希和、「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確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並重」只是對學生的單方面要求，側重不同的兩派教師依舊各自為謀，不但沒能並重彼此的優長，關係且一度相當緊張，結果是學生中真能做到兼收並蓄的也不多。²⁷相比這種平行而少有交會的「並重」，洪業主導的燕京大學歷史系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開始推行的是一種更強調「匯通」的培養模式。以分析與綜合的關係來說，洪業受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時的老師羅克韋爾(William Rockwell, 1824-1894)的影響，強調「歷史家把事實篩濾過後，加以價值判斷是不可躲避的責任」，²⁸而價值判斷正是一種初步的綜合工作。因此，雖然洪業的研究無不建立於充實的證據和精密的考訂之上，但他從來不是史實既明則史家之能事已畢的考證主義者。正如他在「史學方法」課上要學生掌握歷史的5個W(who, when, where, why, how)，²⁹但考試時從來「不問甚麼人、何處、何時的問題」，「問的是如何與為甚

²³ 關於陳寅恪在清華大學歷史系開設的課程，參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314-48。

²⁴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載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270。

²⁵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頁462。

²⁶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頁269-70。

²⁷ 忻平：〈治史須重考據，科學人文並重——南加利福尼亞州何炳棣教授訪問記〉，《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1期，頁101；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115-16。

²⁸ 陳毓賢：《洪業傳》，頁95。

²⁹ 王鍾翰著、諸同學整理：《王鍾翰學述》，頁35。

麼」。³⁰洪業認為「讀歷史得知道時代趨勢、社會制度。如何與為甚麼這是汁漿，其他都是渣滓。」³¹洪業致力於匯通史學分析與綜合的努力，還體現在對斷代史和通史課程的統籌兼顧上。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學，由傅斯年幕後實際主導的史學系主張治史當自斷代入手，不提倡講通史。從1932年開始，北大史學系規定中國史方向的學生必須將「上古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遼金元史」、「明清史」全部修完始得畢業。當時，政府規定「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北大雖也奉命照辦，但強調通史非急速可講，須各家治斷代史、專門史稍有成績，才能會合成通史。所以北大的「中國通史」課，是分聘當時治斷代史有專精者以分段拼合的方式講授的，³²被錢穆斥為合而不通。³³這種斷代史優先的課程設置，正是「史學不是著史」、「反對疏通」理念的直接體現。³⁴和北大剛好相反，清華大學歷史系雖然號稱「並重」，但在斷代史設置方面熱情始終不高。在蔣廷黻剛剛上任的1929至1930學年，僅開設一門「宋遼金元史」供自由選修，此後幾年也沒有追求「短期內能包括國史之各方面及各時代」，直到抗戰前的1936至1937學年，才勉強把斷代史科目從上古覆蓋到清代。³⁵與此同時，卻以最快速度打造了包括「中國通史」、「西洋通史」、「日本通史」、「英國通史」、「美國通史」、「俄國通史」以及「希臘史」、「羅馬史」、「蒙古史」在內的通史陣容。³⁶這當然也是蔣廷黻、雷海宗強調「西史為用」、宏觀綜合的直接產物。相比之下，燕京大學歷史系是國內高校中最早開設中國斷代史課程的，早在1925至1926學年已將先秦到清代的七門斷代史鋪設完備。此後只是段落劃分時有不同，總體趨勢是時段越分越細、課時越來越長。³⁷不過，燕大歷史系並不認為斷代史足以取代通史，更沒有強制全部

³⁰ 陳毓賢：《洪業傳》，頁124。

³¹ 同前注。

³²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70。

³³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51冊，頁175。

³⁴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卷，頁3、9-10。

³⁵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斷代」史——民國時期大學「中國通史」講授體系之演變〉，《史學集刊》2011年第1期，頁61。

³⁶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318-47。

³⁷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斷代」史——民國時期大學「中國通史」講授體系之演變〉，頁61。

修完才能畢業，只把斷代史作為學生明確研究方向後相應的深造課程，並規定在進入具體某一時代的專門化學習之前，要有通史的訓練作為預備。這種訓練旨在引導學生注意時代的分合，明其意義與因果，注意文化的發展，求其變化之痕迹，注意社會的進化，能作綜合之觀察。³⁸值得注意的是，清華歷史系的斷代史和通史課程，兩套陣容、互不相涉。北大史學系的斷代史和通史課程，一度只是斷代史的兩副面孔。惟有三十年代的燕大歷史系，是鄧之誠一身兼任中國通史和六門斷代史中的四門，一人分飾通貫、專精兩種學術風貌，致力將歷史的分析與綜合打成一片。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理念和言行作派頗有老舊遺風的鄧之誠，在洋派西化的燕京大學略顯另類。³⁹他能在歷史系的教學體系中肩負重任，和他在匯通史學的分析與綜合這一點上與洪業相得益彰、配合默契有很大關係。

因為視分析與綜合為史學所兼有的兩步工序，自然也無法回避與社會科學聯手發展的問題。與清華歷史系的大而化之，及北大史學系的拒之門外不同，⁴⁰社會科學在燕大歷史系被分為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而區別對待。作為學術視野的社會科學知識，有助於明確甚麼可以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研究一個問題可以從哪些不同的歷史面相入手。具體而言，就是在社會科學視野下，產生了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民族史等全新的研究門類，相關課程或在歷史系有專人講授，或要學生去其他學系選修，務期對構成歷史的各種因素取得全面的認識。⁴¹與此同時，燕大歷史系對諸如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民族學等作為歷史解釋方法的社會科學理論，卻保持著審慎的態度。在洪業看來，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民族史體現了歷史發展的時、空維度，而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民族學卻試圖建構超越時空的公理定律。無法借實驗以見真假的歷史，是不能專靠理想化的法則來推測的，往往因為時代、地域之不同，所推測者適相反。⁴²進而言之，史學要解答的是「人類怎樣會變成現在的境況」的問題。對此，「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僅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一部分」，而史學卻有義務提供一個相對「圓滿」的解答，為此幾乎要對人類的一切企圖作出檢

³⁸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 538-41。

³⁹ 詳王鍾翰著、諸同學整理：《王鍾翰學述》，頁 30 及陳毓賢：《洪業傳》，頁 177。

⁴⁰ 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06。

⁴¹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 536-44。

⁴² 洪業：〈歷史在近代學術中之位置〉，《洪業論學集》，頁 193-96。

討。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與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以及自然科學，都有連帶關係，這關係並不比牠與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經濟學等來得疏遠」。⁴³也就是說，史學研究應該集科學方法之大成，努力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維持一種養分的平衡，而不是一家獨大、各走極端。最後，和傅斯年一樣，洪業也反對「國學研究」的觀念，他認為學問沒有國界，正如不能把歐洲的科學、文學和歷史籠統地歸入「歐洲學」一樣。1924年擔任燕大文理學科主任後，洪業最核心的一項工作議題就是怎樣把中國幾千年來累積的學問納入現代大學課程的框架，他認為諸如「中國的考古、藝術、歷史、哲學、宗教等科目都該與西方的這些科目相互結合，一起教學」。⁴⁴洪業深信中國的學問，「不能孤芳自賞，……應該讓有現代訓練，有世界常識的人來研究」。⁴⁵他不但力主解散以中國傳統治學方法培養國學人才的燕大國學研究所，⁴⁶還鼓勵有志於在中國史方面有建樹的學生去國外接受西洋史的系統訓練，回過頭來「以西洋方法整理中國史，以中國眼光研究西洋史」。⁴⁷相比清華歷史系一面強調中國史與外國史並重、西史方法為中史研究所用，一面卻「只求叫學生對西洋史能得一個整個而比較充份的瞭解」，⁴⁸而並不設置外國史的研究生方向。⁴⁹洪業認為想要真正掌握西史方法，惟有切實地投入西洋史的具體研究，而不僅僅只是

⁴³ 北平私立燕京大學編：《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本科各學院學系概要》，佈告第13號第17屆（北平：私立燕京大學，1932年），頁4。原書未見，轉引自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頁39-40。燕大歷史系的教學理念，與洪業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導師，美國「新史學」派奠基人魯濱遜（James H. Robinson, 1863-1936）頗多暗合之處。魯濱遜提倡跳出政治與戰爭的框架，主張「一、把歷史的範圍擴大到包括人類既往的全部活動。二、用綜合的觀點來解釋和分析歷史事實。三、用進化的眼光考察歷史變化，把人類歷史看成為一個『繼續不斷的』成長過程。四、研究歷史的功用在於幫助人們了解現狀和推測未來。五、利用歷史知識來為社會造福」。見詹姆斯·哈威·魯濱孫著、齊思和等譯：《新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出版說明〉，頁2。

⁴⁴ 陳毓賢：《洪業傳》，頁129。

⁴⁵ 同前注，頁175-76。

⁴⁶ 同前注，頁176。

⁴⁷ 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頁69。

⁴⁸ 雷海宗：〈對於大學歷史課程的一點意見〉，載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889。

⁴⁹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754-55。

滿足於基本知識的灌注，或以旁觀的姿態領略他人的既有成果。洪業不贊成將「中西體用」的模式套用在中國史和西洋史的關係上。他認為如果中史之「體」沒有結構性的演進，則西史方法也未必能合用。另一方面，中國史研究對西洋史研究也並非全無用處。所以，既不是「中體西用」，也不是「西體中用」，而應該「中西兼體，中西並用」，⁵⁰真正打破中史和西史的藩籬，將二者統一在「歷史科學」的名下。

1928年，燕京大學和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之後，每四年可以推薦一名學生去哈佛攻讀博士學位。1931年，洪業把第一個去哈佛的名額給了以研究先秦史見長的齊思和，齊思和卻並不想去。齊思和說：「四年的功夫在中國可以做出很多成績來，到美國去我做甚麼呢？做中國史？那裏沒有書，教授也不如中國。」但洪業以為出國學習不必拘於畛域之見。他建議齊思和去了就學當地最強勢的學科——美國史，「雖然美國歷史比較短，但是他們研究得比較深，你可以學習他們研究的方法，回來之後用這種新方法研究中國史，對於中國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⁵¹

齊思和留學時的哈佛大學歷史系是美國史研究的重鎮，雲集了麥基文(Charles H. McIlwain, 1871–1968)、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1888–1965)、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 1887–1976)等大師級學者。齊思和遵照洪業的規劃，「主修美國史，選修英國史、世界中世紀史、政治思想史、史學方法、國際關係史及西洋現代史等課程」。⁵²他的博士論文〈春秋時期中國的封建制度〉(“Chinese Feudalism During the Ch’un-Ch’iu Period”)看似回到傳統中國史的領域，實則從政治體制、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入手，對「封建制度」這一世界史課題作中西比較的開創性研究。⁵³既體現了西史的方法與視野，又補充了中國的視角與材料，說明封建制度在世界歷史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這篇以西洋方法整理中國史，以中國眼光研究西洋史的博士論文，不但得到美方評審的一致好評，也受到以清華為代表的國內西史學界的推崇。何炳棣謂從觀點、方法和論

⁵⁰ 劉子健：〈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頁79。

⁵¹ 齊文穎口述：〈齊思和：燕園第一位哈佛博士〉，收入陳遠：《消逝的燕京》（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頁41–42。

⁵² 齊文心：〈先父齊思和生平及著作簡述〉，《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頁294。

⁵³ 楊釗：〈齊思和的中國史博士論文與哈佛大學的美國史學術傳統〉，《史學史研究》2019年第1期，頁43–50。

斷上，對他啓益良多。⁵⁴回國後，齊思和繼續從事春秋戰國史的研究，同時又在北平師範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講授美國史、西洋現代史、史學概論等課程，⁵⁵致力於古今中西史學的融會貫通、冶於一爐。抗戰爆發，國立院校內遷，齊思和由北平師範大學轉回母校任教。1938年2月正式受聘為歷史系副教授，1939年9月代理系主任，開始推行加強西洋史專門人才培養的課程改革。⁵⁶凡此，皆與洪業推行「中西兼體，中西並用」的史學方針一脈相承。

洪業致力於匯通中西歷史、科學方法、史學分析與綜合的努力，在哈佛燕京學社雄厚的財力支持下，⁵⁷借助戰前人文學術「黃金十年」的發展勢頭進行得風生水起。燕大歷史系不僅擁有由洪業（史學方法）、顧頡剛（先秦史）、鄧之誠（中國通史）、張爾田（史學史）、張星烺（南洋史地）、容庚（金石學）、許地山（宗教史）等資深學者組成的教授陣容，還為齊思和（比較史學）、馮家昇（東北史地）、譚其驤（移民史）、朱士嘉（方志學）、韓儒林（西北史地）等開拓史學新領域的後起之秀，提供了嶄露頭角的舞臺。⁵⁸論者注意到，洪業習慣於按照斷代史和專門史的方向有計劃地培植史學人才，如鼓勵齊思和研究春秋戰國，瞿同祖研究漢代，周一良、王伊同研究魏晉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馮家昇研究遼代，聶崇岐研究宋代，翁獨健、蒙思明研究元代，房兆楹、杜聯喆夫婦和王鍾翰研究明清，鄭德坤研究考古學，侯仁之研究人文地理，張天澤研究海交史，鄧嗣禹研究制度史，⁵⁹仿佛給人一種要與主張治史當自斷代和專題入手的史

⁵⁴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128。

⁵⁵ 齊文心：〈先父齊思和生平及著作簡述〉，頁294-95。

⁵⁶ 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頁62。

⁵⁷ 據樊書華研究，1928年末，哈燕社獲得價值640萬美元的霍爾遺產基金，其中約190萬美元為專項基金，即哈燕社為六所在華合作大學和印度阿拉哈巴德農業研究所（Allahabad Agricultural Institute）代管的信託基金。基金投資的年收入按照比例發放給燕京大學（5/19）、嶺南大學（3/19）、華西協和大學（3/19）、金陵大學（3/19）、福建協和大學（2/19）、齊魯大學（2/19）、阿拉哈巴德（1/19）。在華六校的收入，主要用於中國人文學教學、研究和出版。見《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84-85。

⁵⁸ 王鍾翰著、諸同學整理：《王鍾翰學述》，頁29。並請參考燕京大學歷史學系1928-1941年課程說明，見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頁513-74。

⁵⁹ 劉子健：〈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頁79。各人的具體研究方向並請參考王伊同：〈先師洪煨蓮先生（1893-1980）傳略〉一文中的記述，《王伊同論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上册，頁395。

語所一爭高下的感覺。⁶⁰事實上，這些為洪業所圈定的專史人才，往往兼有洪門弟子與鄧門高足的雙重身份。既在史識上深受鄧之誠的點撥，又在中西史學方法的匯通上得洪業調教，且多有出國深造的經歷，對專精與博通、通識與考據、中國課題與世界眼光之間的關係，有更為通達的認識。曾經出入於燕大和史語所的周一良注意到，即使研究同樣的斷代問題，在洪業和傅斯年兩種不同的培養模式下，寫出的文章路子也有所不同。⁶¹

有了專業化的師資隊伍和標準化的培養模式，洪業還鼓勵並支持歷史系師生創辦自己的學術團體和機關刊物，朝專業史家的方向邁進。1927年，燕京大學歷史學會正式成立。隔年出版會刊《史學年報》，刊布學會成員的研究成果以就正於海內外同行。在洪業、顧頡剛和鄧之誠的指導下，由齊思和、朱士嘉、翁獨健、鄧嗣禹、蒙思明、王鍾翰等在讀學生輪流主編，⁶²不但刊登洪業、鄧之誠、顧頡剛、陳垣等知名學者的研究成果，還擇優發表歷史系學生的畢業論文，甚至師生間對同一問題持不同看法的質疑問難。《年報》問世之後，引起國內外學界的重視，與綜合文史哲研究的「《燕京學報》一樣被列入當時全美史學會集議挑選的10種中國優良學術雜誌」；「並被國內圖書館專業雜誌列為每個圖書館最低限度所應館藏的史地類期刊之一」。⁶³《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將其列入五種值得關注的中國學術雜誌，伯希和主編的《通報》(*T'oung Pao*) 也對《史學年報》的內容作有專文評論。⁶⁴這自然是對洪業一手打造的新史學「燕京學派」的總體肯定。

由於《史學年報》刊登的國內外學術動態頗受學界好評，燕大史學會從1936年10月開始又單獨發行《史學消息》月刊，擬從《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報》(*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東方學院學報》(*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東方語言學會刊》(*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東方學報》(*Acta Orientalia*)、《泰東》(*Asia Major*)、《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通報》、《河內遠東

⁶⁰ 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頁275。

⁶¹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25。

⁶² 齊思和：〈史學年報十年來之回顧〉，《史學年報》第2卷第5期（1938年），頁543–44。

⁶³ 詳參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頁162。

⁶⁴ 同前注。

博古學院學報》(*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亞洲藝術》(*Artibus Asiae*)、《支那學》、《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東洋學報》、《東方學報》(東京、京都)、《史學雜誌》、《史林》、《史淵》、《考古學雜誌》等歐洲和日本的重要學術刊物中，摘取關於漢學的精心著作，逐期提要披露，⁶⁵務期使編者(燕大史學系學生)同讀者一道養成洪業提倡的「世界眼光」。

二、葉理綏登場

洪業以燕京大學為基地，以史學建設為中心，要與法國和日本漢學一爭高下的計劃，並未因為日本的軍事入侵而遭受毀滅性打擊。借助美國校董會的背景庇護及哈燕社的經濟援助，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燕大歷史系的師資力量和教研標準仍可維持戰前水平。⁶⁶真正的危機反倒來自其跨國學術合作的對象，燕大中國人文學研究的長年「金主」——哈佛燕京學社位於美國麻省劍橋的總部。尤其俄裔法籍日本學家葉理綏在1934年出任社長，推行一系列優先保證在哈佛大學打造國際一流東亞研究中心的政策後，這種危機感更是日漸明朗。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給了葉理綏最好的藉口，減少在中國尤其是淪陷區的投入，而把更多資金用於拓展哈佛中心的東亞學建設。⁶⁷葉理綏的俄文本名為謝爾蓋·格里高利耶維奇·葉利謝耶夫(Sergei Grigorievich Eliseyev, 1889–1975)，日文名字叫「英利世夫」。關於這位東京帝國大學國文學科(日本語言文學)第一位外國人畢業生、與伯希和風誼師友間的俄國流亡學者、哈燕社首任社長及美國的「日本學之父」(一說「遠東研究之父」)，有必要結合英、俄兩方面的材料對其個人生平和學術道路稍作梳理，⁶⁸以便瞭解他以一個日本學家而能出任一度以中

⁶⁵ 劉選民：〈本刊的內容〉，《史學消息》第1卷第1期(1936年10月)，頁2–3。

⁶⁶ 詳參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頁59–62。

⁶⁷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60–61。

⁶⁸ 英文方面最詳盡的記述仍推 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 的“Serge Elisséeff”一文，載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2 (Jun. 1957): 1–35。俄文方面的材料則有賴閻國棟的〈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一文。如欲全面瞭解葉氏對日本研究之關注及貢獻，還應參考日本方面的相關研究文獻，如倉田保雄：《エリセーエフの生涯：日本学の始祖》(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榎一雄：〈三人の日本学者の逝去—エリセーエフ・ムッチヨリ・アグノーエル〉，《東洋學報》第59卷第3・4號(1978年)，頁370–72；羽田明：〈エリセエフ教授を悼む〉，《東方學》第51輯(1976年)，頁134–37。

國文史研究為重的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並在主政期間推行連串行政和教研新舉措的時代與學術背景。

1889年，葉理綏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富商家庭，祖上是自由農民，1813年開始從事食品行業。由於經營有方，名下店鋪遍布聖彼得堡、莫斯科、基輔等大城市，建立起龐大的食品經銷網絡，並於1910年獲得世襲貴族身份。葉理綏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十幾歲之前母語之外還掌握了法、德、英等歐洲現代語言及希臘、拉丁等古典語言。他無意繼承父輩的商業帝國，卻對繪畫和東方藝術表現出濃厚興趣。⁶⁹為此，曾於1906年專程拜訪俄羅斯東方學元老、專長佛教研究的奧登堡(Sergey Oldenburg, 1863–1934)，表達想去牛津大學學習中文的意願，希望得到奧登堡的建議。奧登堡認為學習中文不如學習日文，因為當時的歐洲不乏受過良好訓練的漢學家，而真正訓練有素的日本學家卻少得可憐。鑒於日本在諸如對俄戰爭等一系列國際事務中表現出的強勢崛起，培養一個實力堪比日本本國學者的西方日本學家，對俄羅斯乃至整個歐洲來說勢在必行。奧登堡建議葉理綏，高中畢業後馬上赴柏林大學學習漢語和日語，熟悉西方的東方學研究方法和成果。一年後再赴日本，正式註冊為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言文學系學生。所以要先去柏林而不是巴黎，是因為德國對近代日本教育的影響更深，一個來自柏林大學的西方學生，比其他任何大學的學生更有機會被日本的大學錄取。此時距葉理綏高中畢業還有一年多，奧登堡的這番顯然經過深思熟慮的建議，決定了葉理綏一生的事業方向。

1907年，葉理綏在高中畢業的兩天之後，帶著奧登堡的推薦信踏上了前往柏林之路。他加入著名閃語學家薩肖(Eduard Sachau, 1845–1930)主持的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修班(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但那裏的日語教學並不理想。日語教授普勞特(Hermann Plaut)甚至沒有去過日本，而日本外教市川代治說的是日本西北海岸一帶的方言。相比之下，柏林大學的漢學陣容要強大得多。葉理綏的漢語老師是著名的漢學家葛祿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他還在福蘭閣的指導下閱讀《孟子》。除了語言學習，葉理綏還修讀了魯道夫·朗格(Rudolf Lange, 1850–1933)的「德川時代歷史」課程。

⁶⁹ 本段至此之敘述，引自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6。

與課堂學習同樣讓葉理綏受益的，是當地一些中亞和遠東問題學者的非正式聚會，通常每隔一周的星期五在一家餐館舉行。他在那裏見到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繆勒 (F. W. K. Müller, 1863–1930)、格倫威德爾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等中亞歷史、語言、考古學巨擘。葉理綏發現這些非正式場合的討論令人興奮，雖然內容未必都能聽懂，卻也借此拓展了自己的東方學視野。在柏林，葉理綏也結識了一些前來訪學的日本學者，他們對葉理綏的赴日留學計劃抱以極大興趣，但也告誡說「作為第一個試圖成為日本帝國大學正式學生的西方人，無疑將遇到很多困難」(as the first Occidental to attempt to become a regular student at a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he would undoubtedly encounter many difficulties)。1908年夏天，完成了在柏林一年的進修之後葉理綏回到聖彼得堡。短暫休整後於8月坐火車沿西伯利亞鐵路前往日本。他在柏林結識了日本語文學家新村出 (1876–1967)，新村給他引見了東京帝國大學日語教授上田萬年 (1867–1937)。在上田和奧登堡的老朋友印度學家高楠順次郎的幫助下，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破例接受了這名還沒完成日本高級中學課程，日語和漢文水平遠不如普通日本中學生的俄國青年。當得知自己被順利錄取的喜訊時，葉理綏立刻購置了一套日本學生裝。當地的印章篆刻師用「英利世夫」四個字對應 Elisséeff 的漢文音讀，這個日文名字他一直使用到老。為了掌握日語，葉理綏和一個在《每日新聞》社工作並有兩個孩子的男子合租一所房子。⁷⁰

兩年後，葉理綏獨力租下一座有七間屋子的府邸，還按德川封建主家庭的規制僱傭了一班「家丁」。他的穿著也從學生裝逐漸變成和服，甚至更老派的文人雅士打扮。每天從早到晚學習日語，沒有周末也沒有假期。⁷¹到第二學年時，葉理綏已經能夠聽懂老師講課的全部內容，課程作業也毫無困難。課餘時間，他就去聽話家 (はなしか，即專業的故事講述者) 幽默的寄席 (よせ) 表演，學習模仿他們粗鄙的演講。他還去聽長唄 (ながうた) 演奏會，努力瞭解大學老師也未必都懂的日本音樂。他頻繁出入歌舞伎劇場，與很多演員結交，並能模仿

⁷⁰ 以上敘述，編譯自 Reischauer, “Serge Elisséeff”: 7–11。

⁷¹ 葉理綏先與《每日新聞》職員合租、兩年後又獨力租屋並僱傭家丁、改變服飾等事，見 Reischauer, “Serge Elisséeff”: 11。其獨立承租的府邸有七間屋，從早到晚、沒有周末和假期地學習日語等事，見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79。

他們的措辭與舞姿。他和研究生小宮豐隆一道，出席著名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的周四例會，也在自己的豪宅組織月度茶會，與永井荷風（1879–1959）、森田草平（1881–1949）、久保田萬太郎（1889–1963）等青年作家討論法國、德國和俄羅斯文學。大學三年級時，受日本政治家犬養毅（1855–1932）的影響，又對日文章書發生興趣。1912年6月，葉理綏本科學習期滿。他的畢業論文研究的是日本十七世紀著名詩人松尾芭蕉（まつお ばしょう，1644–1694）的俳句（はいく），主考教授對其口試環節的表現非常滿意，給予相當於 A- 的 82 分。葉理綏本應和日本的優秀生一樣獲得明治天皇的獎品，卻因為外國人的身份而被認為「不應受此殊榮」。⁷²雖然不無遺憾，葉理綏還是如願成為東大歷史上首位取得大學學位的外國學生，並以優異成績獲得研究院的入學資格。

讓葉理綏萌生回國想法的，是時任東大客座教授的德國經濟學家溫蒂希（Heinrich Waentig, 1870–1943）。溫蒂希曾讓葉理綏準備一篇可以拿到「德國東亞自然與民俗學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宣讀的有關芭蕉的論文，但在讀過葉理綏的文章後，卻指出該文條理不清、缺乏問題意識。又認為葉理綏的語言能力和知識儲備遠遠超過了他組織材料以滿足西方學術要求的能力，因此建議他繼續在西方而不是日本學習。事實上，早在葉理綏大學二年級時，以研究日本歷史文獻著稱的德國學者卡爾·弗洛倫茨（Karl Florenz, 1865–1939），就對他表示過類似意見。卡爾不建議葉理綏朝著精研語言的方向無止境地努力下去，而是勸他儘快抓住一些「問題」，在一些專門領域，比如《萬葉集》（万葉集）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學問基地。當時的葉理綏婉拒了卡爾的建議，而溫蒂希的這番再度提醒卻讓他頗為所動。但與其說是西方的學術環境，倒不如說是趁俄國的日本研究剛剛起步，儘早在聖彼得堡大學謀得一個教職的前景更令他鼓舞。就在1913年的夏天，聖彼得堡大學的中文教授、著名漢學家伊鳳閣（Aleksii I. Ivanov, 1878–1937）訪問東京時，曾明確表示自己和同事們都歡迎像葉理綏這樣訓練有素的日本學家成為他們中的一員。1914年夏，葉理綏回到闊別六年的祖國。憑藉在教育部和科學院的人脈，他在日本取得的學位為沙皇政府承認，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文系也接受他成為博士候選人。在伊鳳閣和有「阿翰林」之稱的漢學家阿理克（Vasily M. Alekseyev, 1881–1951）的指點下，葉理綏順利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並於1916年初被任命為聖彼得堡大學日語講師，很快又成為帝俄外交部的日文翻譯和亞洲博物館館

⁷²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31。

員。同時，還擔任了俄國商會遠東部副主任、東方研究會日本分會主席、考古學會遠東分部秘書。⁷³

就在職業生涯起步炙手可熱之際，十月革命爆發了。葉理綏家族的財產被沒收，家人也遭到禁錮，他就快完成的博士論文手稿隨帝俄外交部的非官方文件一起被焚燬。為了解決一家人的生計，葉理綏不得不四處兼職。1919年，尤登尼奇的白軍向彼得格勒發動進攻，形勢非常嚴峻。為了防止城內的反動勢力裏應外合，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對有可能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構成危害的人士實施了嚴厲的管制。1919年5月27日，「契卡」搜查了葉理綏的家並逮捕了他。葉理綏被押解到警備司令部，隨後被轉往軍事監獄。經過若干次審訊後，他終於明白自己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家庭出身而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還有一些知識分子，他們被稱為「人質」，也就是說，一旦白軍攻入城內，他們將被提前槍決。獄中的葉理綏對命運感到茫然，但仍不失時機地委托被釋放的獄友通知家人和聖彼得堡大學設法營救自己。他閱讀隨身攜帶的夏目漱石的小說《彼岸過迄》，以消磨令人窒息的獄中時光。經過聖彼得堡大學的同人尤其是漢學家阿理克的積極營救，葉理綏在入獄10天後獲得釋放。但他並未獲得真正的自由，一言一行都在「契卡」的監控中。與此同時，家中的生活日益艱難，葉理綏本人的健康也每況愈下。他完全沒有心情和條件從事科學研究，最大的願望就是讓在饑餓、寒冷和恐懼中掙扎的一家人活下來，伺機流亡法國。幾經周折，在付出全部積蓄以為代價之後，1920年9月21日的深夜，葉理綏攜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在波羅的海芬蘭灣登上了兩條小船，避開探照燈的搜尋，駛向對岸的芬蘭。一個月後，一家四口來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三個月後輾轉至巴黎。⁷⁴

憑藉日本學的專業背景和卓越的語言才華，葉理綏不但在著名的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找到了研究助理的工作，還被日本駐法大使館聘為翻譯，協助推進各種文化交流活動，並主辦一份名為《日本與遠東》(*Japon et Extrême-Orient*)的月刊，向法語讀者介紹日本的歷史、文化和學術。安身立命之餘，葉理綏開始接續被打斷的學術生涯。繼《日本與遠東》之後，他又在《亞洲藝術評論》(*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上用法語撰述和翻譯了大量文章，介紹日本文化、

⁷³ 以上敘述，摘譯自 Reischauer, "Serge Elisséeff": 12–19。

⁷⁴ 本段敘述，引自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6–17。

研究日本學術，旁及漢學、藏學、蒙古學以及韓國研究，涵蓋藝術、考古、語言、文學、歷史、宗教多個領域。1922年，葉理綏以客座講師的身份在巴黎大學講授「德川時期文學」，並在巴黎的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 (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講授「日語文言語法」直到1930年。1928–1929年，他又在盧浮宮學院講授「日本藝術史」。1930年，被任命為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宗教史分部的助理教授，講授日本神道，帶學生讀漢文《妙法蓮華經》。兩年後，在印度學家烈維 (Sylvain Lévi, 1863–1935) 的建議下，高研院專門為葉理綏設立了「日本宗教」的講座教授席位。葉理綏的學術生命至此徹底復蘇，儼然已是西方學界的日本研究權威。重建日本學研究的同時，利用身在世界漢學之都的便利，葉理綏也常常去旁聽伯希和、馬伯樂 (Henri Maspéro, 1883–1945) 及印歐比較語言學家梅耶 (Antoine Meillet, 1866–1936) 在法蘭西公學 (Collège de France) 的講課，⁷⁵ 成為繼阿理克之後又一位系統接受過法國漢學熏陶的俄國東方學家。阿理克一生奉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為師，而葉理綏在日本學尤其是語言和藝術方面的造詣，很可能給伯希和留下良好的印象，⁷⁶ 乃至學界一直有葉理綏是伯希和及門弟子的說法。

幾乎在獲得巴黎大學講座教席的同時，「葉理綏收到了來自哈佛燕京學社的邀請，請他作為訪問教授講學一年」。⁷⁷ 準確地說，是利用一年時間考察他能否勝任哈燕社社長的工作。哈佛燕京學社成立於1928年，在電解鋁工藝發明者霍爾的遺產基金支持下，致力於促進亞洲的高等教育事業，成立伊始就啓動了加強燕京大學在中國人文學領域的研究生教育，資助燕京、齊魯、金陵、福建協和、廣州嶺南、華西協和等六所教會大學在中國人文學領域的本科教育的項目。為了給在華項目確立更高的學術標準，哈燕社理事會認為需要由一位有學術聲望的社長來領導學社的工作。理想的人選必須既能規劃哈佛的東亞學課程，又能有效監管並處理好與中國合作大學的關係。他們想邀請在中國和日本都享有盛譽的伯希和出任此職，但被謝絕。伯希和轉而推薦葉理綏。⁷⁸

⁷⁵ 以上敘述，採自 Reischauer, “Serge Elisséeff”: 21–22。

⁷⁶ 丹尼斯·塞諾謂伯希和「不喜歡那些在他看來侵入到他領域的人」，「只支持那些其興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獵區以外的人」。見丹尼斯·塞諾著、羅新譯：〈懷念伯希和 (1878–1945)〉，頁405、406。

⁷⁷ 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9。

⁷⁸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78。

這讓葉理綏陷入了兩難，他實在不願放棄經過十多年奮鬥剛剛到手的教職和法國優越的學術環境，去到就漢學或東亞研究而言還只是「窮鄉僻壤」的哈佛。然而，此事卻得到伯希和與烈維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伯希和，極力鼓動葉理綏接受哈佛的邀請。在寫給當時已經是蘇聯科學院院士的阿理克的信中，葉理綏坦言：「伯希和私下對我說，我應該在哈佛獲得一個更好的位子，這對我而言更有意義，讓我不要自謙，因為這對日本學的發展非常重要，而且，我巴黎的同事們也將會為哈佛有自己人而感到高興。」⁷⁹

信的內容顯示，以史語考證見長的伯希和已將葉理綏視為「巴黎學派正統」的「自己人」了，並把日本學的發展或者說東亞學的興起視為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擴充與必然趨勢。他認為能夠為這一新的學術增長點提供各方面保障與支持的是崛起中的美國，而不是盛極而衰的歐洲；葉理綏的哈佛之行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發展問題，更關係到法國漢學能否開闢第二戰場，延續輝煌的傳統。

1932年9月，葉理綏將兩個兒子寄養在巴黎的親友處，攜妻子乘船前往美國。9月底，正式開始在哈佛的課程，第一學期講授日本歷史，第二學期帶學生讀《史記·項羽本紀》，講解漢語語法。他同時還應波士頓羅威爾學院 (Lowell Institute) 之邀，就「日本文學對日本繪畫的影響」，做了八次講座。⁸⁰ 這期間，葉理綏為哈燕社制定了一個大力拓展在哈佛本部工作的宏大計劃，包括將哈佛大學的東亞語言和文學教學整合為一個獨立的系，鼓勵學者和學生對亞洲文明進行科學的研究，出版亞洲研究方面的學術刊物，創建一個強大的圖書館等。⁸¹

1933年夏，葉理綏結束講學離開麻省劍橋。哈佛方面對葉理綏的工作非常滿意，希望他考慮一年之後再來，正式出任哈佛大學遠東語文系（其時尚未組建）主任和哈燕社社長。經過反復考慮，葉理綏決定接受哈佛的邀請。在1934年致阿理克的信中，他坦承哈佛方面提供的待遇相當優厚：「說實話，要不是因為微薄的收入，我是寧為鳳尾，不做雞頭的。這一年的巴黎生活讓我確信，依靠這裏的收入，我無法讓一家四口過上簡樸的生活，也不能讓孩子們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應該為哈佛這個不可思議的職位而高興，這讓我有條件資助尼基

⁷⁹ 此段敘述及書信，均見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9。

⁸⁰ 這段開頭至此，見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9。

⁸¹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80。

塔和瓦吉姆(葉理綏的兩個兒子……)上大學。」「當然，這裏〔哈佛〕不是沙畹與伯希和創建了漢學的法國，但也有許多事情可以做！」1934年9月12日，葉理綏和妻子從勒阿弗爾港啓程，於19日抵達紐約，開始了他在哈佛燕京學社長達二十三年的工作。⁸²從1931年開始，葉理綏夫婦就已獲得法國公民的身份。他們一生珍視這一身份，認為是法國讓他們一家重獲新生。從1934年任職哈佛到1957年退休返回巴黎，夫婦倆在美居住二十三年卻沒有加入美國籍，他們認為自己對法國的認同比土生土長的法國人更為深厚。⁸³

三、從合作到指導

燕京大學從一開始就反對提名葉理綏為哈燕社社長。時任哈燕社北平辦事處執行幹事的博晨光(Lucius C. Porter, 1880–1958)認為儘管葉理綏是一名出色的日本學家，但在中國研究領域並沒有很大的名氣，與中國的傑出學者之間也沒有像和日本學界那麼緊密的聯繫。提名葉理綏會造成中國文化研究在哈佛和燕京的跨國合作項目中被削弱的印象，這可能會引起中國學界的反感。他還擔心葉理綏的法國老師，包括伯希和、馬伯樂和葛蘭言等，並不真正欣賞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這將影響到葉理綏的態度以及哈燕社未來對燕大及其他合作院校的支持力度。博晨光傾向於找一位能够欣賞中國學者研究工作的真正漢學家，他推薦時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前在華傳教士、北京華文學校教師恒慕義(Arthur Hummel, 1884–1975)為社長候選人。燕大校長司徒雷登也有同樣的顧慮，他委托哈燕社創始人和理事之一的諾斯(Eric M. North)在1933年的哈燕社理事會上陳述了燕大的立場：既然哈燕社的首要目標是在中國的一些院校(教會大學)加強中國研究項目，那麼重點就應該放在中國而不是哈佛。鑒於葉理綏的日本教育背景和作為日本學家的知識興趣，燕大懷疑他是否有能力和意向，通過拓展在華項目來完成學社的主要目標。然而，此時的哈燕社理事會已經聽不進任何反對的聲音。葉理綏在哈佛一年間的教學表現讓理事們確信，作為一名「精通日本文學」並接觸了「大量有關中國的寶貴材料」的學者，葉理綏擁有「遠遠超越只了解中文和歐洲語言的學者的優勢」。⁸⁴雖然他們對恒慕義的

⁸² 哈佛燕京學社與葉理綏就職務間的磋商，以及葉理綏的書信，均據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9–20。

⁸³ Reischauer, “Serge Elisséeff”: 23.

⁸⁴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80。

印象也很好，但理事會認為「應該尋找一位學術成就高於恒慕義的人選」。⁸⁵至於「學術成就」高下的標準，在「科學的」漢學或東亞學研究剛剛起步的美國，有甚麼能比伯希和的推薦、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講座教授的頭銜，以及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言文學系首位外國人畢業生的經歷，更能說明問題？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名俄裔法籍的外來「淘金」者，葉理綏提出利用哈燕社資金優先拓展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項目、為美國培養未來幾代東亞學家的規劃，正中東道主學界想說但礙於跨國合作協議不便宜之於口的下懷——如何把美國企業界人士的捐贈優先用於確保美國學術乃至國家利益的教研項目。1933年11月，哈燕社理事會正式提名葉理綏為學社「終身社長」，從1934年秋季學期開始擔任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終身教授。葉理綏到任後推行的種種新政，證明燕大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

葉理綏在赴任前即已籌劃出版一種屬於哈燕社美國本部的學術期刊。在1934年5月26日致阿理克的信中，他寫道：「如果經費許可，我想出版一種遠東研究期刊，類似伯希和的《通報》……的英文版。」抵達美國兩周後，他對期刊的品位和風格有了更明確的想法：「這應該是一種歷史語言學學報，我個人希望雜誌很快能出版。」1935年1月25日，他在信中告訴阿理克：「準備在今秋推出學報，第一期將是專刊，用來紀念今年1月13日在東京辭世的吳茲〔James H. Woods〕教授。他生前研究佛教哲學，是哈佛東方研究的奠基人。從明年1月開始，我們將定期出版學報。我們計劃一年出版四期，和《通報》一樣每期96頁。我很高興您和蘇聯漢學家將成為學報的撰稿人。撥給我們的經費並不多，因此還不能印刷插圖。文章可以用俄文寫，由我們這裏翻譯。至於稿費，我們還不知道能付多少，也許每頁2-3美元吧。」2月8日，他又寫道：「很高興收到了您關於辭典編纂的論文，但我現在還不能對您承諾甚麼，因為第一期是紀念1月逝於東京的吳茲教授的。只有我們1936年1月出版的第二期才是綜合性的。我們雜誌的名稱是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由於作者的國籍、學術背景不同，《哈佛亞洲學報》創刊號的文章質量良莠不齊。為了彌補缺憾，葉理綏積極為第二期組稿，約稿對象包括法國的馬伯樂以及蘇聯漢學家。他希望曾經翻譯《易經》的漢學家楚紫氣 (Julian K. Shchutskii, 1897-1938) 寫一篇論道教的文章，還想請發現第六種漢語方言——老湘語的龍果夫 (Alexander A. Dragunov, 1900-1955) 為刊物撰稿。在1936年5月20日致阿理克的信中，葉理

⁸⁵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80。

綏寫道：「我花了很多時間看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關於漢代天文學的論文，我寫了幾個簡訊和書評……說句貼心的話，我總是為我不能用母語寫作而感到苦惱，而且是在巴黎生活了多年之後，現在又轉而使用英語。」第二期學報問世後，葉理綏顯然非常滿意，第一時間寄給了阿理克。在1936年7月8日致後者的信中，他寫道：「您大概已經收到7月1日寄出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第二期了。在圖書欄目中可以看到關於您文章的評論。如果蘇聯的雜誌或其他出版物上刊登了關於我們學報的評論，請不吝賜告。現在已經開始籌備第三期了。這一期上將發表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關於觀世音名字的文章。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答應寫一篇文章。魏魯南〔James R. Ware〕也會寫點東西。正在讀彼得羅夫〔Apollon A. Petrov, 1907–1949〕關於王弼的文章，我想寫寫聶曆山〔Nikolai A. Nevskij, 1892–1937，西夏語專家，伊鳳閣的弟子〕。他為何不回我的信？是生我的氣了，不願意和我這個新的法國公民通信？」⁸⁶從《哈佛亞洲學報》的草創過程中不難看出，貫穿葉理綏學術決策的背後動因中，除日本知識興趣和美國學術利益，還有一種母國文化情結和法國漢學信仰。作為伯希和與馬伯樂的忠實信徒，葉理綏堅持要把在歐洲本土漸已式微的史語考證傳統，移植到美國東亞學研究的處女地中。葉理綏在國外已聲名鵲起，而在自己的祖國卻少為人知，甚至很可能不再有機會用母語寫作。他非常同情那些和他一樣遭逢激烈的社會動蕩與變革，卻仍在世界不同地方（包括蘇聯），堅持學術研究的同胞。他希望利用自己手中的資源，給予他們必要的支持，讓他們的成果能為國際學界所知。

相比之下，葉理綏就不大在乎美國本土的漢學界及大洋彼岸的合作夥伴——燕京大學中國人文學研究團隊的觀感。在給阿理克的信中他談到，哈佛燕京學社就是個中美「雜交品種」。中國方面，燕京大學更關心如何借高等教育來傳播美國宗教（葉本人為東正教徒），而很少有人思考漢學研究；美國方面，哈佛大學也不過是借學社的成立，好使用霍爾遺產基金實現自己的學術計劃。無論哪一方都沒有真正的東方學家。⁸⁷在1936年的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年度餐會上，葉理綏對科學的漢學研究作出了自己的界定：

⁸⁶ 此段開首至此，剪裁自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20–22。

⁸⁷ 此段參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19。

漢學，是通過中國文本去研究中國問題，……更多的情形是，中國人了解自己的文法，他們很少能夠向西方人清楚地解釋。他理解中文句子的構成，清楚某種句子，某些表述，但不會解釋。

這也就是為甚麼長期生活在中國、熟悉中文口語的人並不就是漢學家，他們並不能充分利用所有中文文獻去寫作。中國人沒有像我們一樣思考，我們對基督教文本進行了科學的研究，《舊約》用希伯來語寫成，它不僅對西方人是一門外語，而且是另一種語言類型。《啓示錄》用希臘語寫成，每一個對這個文本感興趣的人都不得不查原文，學習這種難懂的古語。同時為了閱讀一些重要的中世紀著作，也必須瞭解拉丁語，相反，儒教經典都用漢字寫成，他們不必進行精確的翻譯。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必知道它們如何發音。現在，甚至每一個省都按照方言來朗讀這些文本。我們似乎不可能科學地理解這些文本，準確地用我們的語音去朗讀儒教經典。

有些人熟悉中國的語言和歷史，他們認為西方人對漢學不會作出真正的貢獻，西方人的著作只是完全依靠中國人已經完成和將要完成的工作。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中國的漢學學者比西方漢學者更重要，這完全理所當然，然而，受過正規訓練的西方漢學家已經寫出了重要的研究著作，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在道教、詩歌以及小說、戲劇這些特別的領域，很難期望漢學家和中國學者對這些領域的材料同樣熟悉。但是對佛教的學習與研究，中國學者同樣顯得並不容易，甚至比西方人更難掌握梵語，更難理解西藏的知識，更難熟悉印度思想家的哲學概念。雖然中國學者可以充分理解中文佛教經典，如果他不曉梵語，對梵語一竅不通，他就會存在嚴重障礙，像鋼和泰這類學者和喇嘛一起進行研究，利用滿文、蒙文、藏文和梵文著作就可以對我們有關中國佛教的知識做出真正的貢獻。……拋開兩位著名的漢學家——沙畹和伯希和不說，我想要提醒你的是，在音韻學領域西方語言學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瑞典學者高本漢現在是哥德堡大學的校長，出版了第一部有關中國語音的科學著作。這本著作利用了中國的方言、朝鮮、日本的發音，馬伯樂教授出版了研究中國的古代語言的一流論文，重建了唐代的發音語系。⁸⁸

⁸⁸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368-70。此乃陳氏翻譯 Serge Elisséeff, "A Paper Read at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Associated Board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pril 21, 1936," 聯董檔案號：011-0258-0918-0924。「聯董」即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本文所引聯董檔案，悉據陳氏之書。

這篇致辭可被視為葉理綏的「歷史語言研究工作之旨趣」。他所以一開始就要把《哈佛亞洲學報》的作者、選題乃至受眾鎖定在他認可的範圍之內，就是為了以清晰的語文學（語言學及文獻學）途徑和方向來引導中、美兩國的漢學，讓伯希和、馬伯樂、烈維及其在東歐的追隨者，成為那些在他看來沒有受過真正語文學訓練的「業餘漢學家」效仿的典範。換句話說，自此以後哈燕社將以「漢學導師」的姿態凌駕於昔日的合作夥伴——燕京大學之上。

葉理綏拓展哈燕社在哈佛中心的項目，以配合其歷史語文學發展方向的一項重要舉措，是整合哈佛大學的中文和日語教學資源，於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7年10月成立了遠東語文系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⁸⁹ 在當月的《哈佛校友通訊》上，葉理綏發表了題為〈哈佛燕京學社的目標〉的文章，闡述建系初衷：

該系的目標是通過一系列課程，提供科學的、不帶感情色彩的有關東亞的知識，這些知識對遠東研究未來的專家、對遠東感興趣未來商人、對為了改善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而擴大知識的一般人都會大有幫助。我相信該系的這一基本目標可以通過三年的強化研究和指導來完成。在這期間，學生應該完成三門中國語言方面的課程、兩門日本語言方面的課程學習，或者是相反的情況。這要由學生主要感興趣的問題來決定，此外，他應該修讀歷史、宗教、文學、藝術方面的課程，這些語言文化背景方面的課程是該系的基礎。⁹⁰

葉理綏的目標是在遠東語文系開設十一門中文課程和四門日文課程。正如他在1936年的聯董年會上所說：

我們的主要興趣是對學生進行中國語言方面的訓練，我們想教他們如何閱讀及分析文本，不要擔心花足夠的時間去理解難以理解的句子。有信心不完全依靠中文老師，而是試圖通過不同的詞典來仔細

⁸⁹ 最初叫「遠東語文部」(Division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1939年改「部」為「系」(Department)，1972年改為「東亞語言與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見“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1930–1940),”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ealc.fas.harvard.edu/1930-1940> (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1年11月20日)。

⁹⁰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132。陳氏翻譯 Serge Elisséeff, “The Aims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聯董檔案號：336-5133-0261。

閱讀，對文本進行評論，我們需要教學生如何利用中文詞典，如何通過反切來找到發音，如何毫不猶豫來利用一本一本的詞典，去理解他們碰到的一個道教俗語，或是一個佛教俗語，或者是其他一個技術性表述。

不管他們從事中國研究的目的是甚麼，學生必須面對中文的書面語言，他們必須能夠閱讀它們，解釋它們，最終翻譯它們。同時，他們必須知道一些哲學方法〔顯然誤 philologic 為 philosophic，從上下文意思判斷，此處當指語文學方法〕，古典文獻和印歐研究領域已經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學生在一些口語的幫助下應該學會猜測一些句子的意思，或者在中國朋友的直接幫助下去猜測它們的意思。中國人自己也常常不能理解疑難的句子，如果沒有大量查閱字典的話。……

中國的知識不只是熟悉有關中國學說學術著作就足够了。哈佛的學生不僅學中文，而且學習日文，日文對中國研究的重要性如同德文對古典研究的重要性一樣，如果學生對語言有興趣，他也可以研究梵語，還可以研究俄語，如果學生能力强，工作勤奮，哈佛燕京學社可以給他提供獎學金。⁹¹

不難看出，葉理綏設想的「遠東學」實際只是遠東語言學加遠東文獻學。在教學力量方面，葉理綏倚重的是協助其編輯《哈佛亞洲學報》的青年漢學家魏魯南和賈德納 (Charles S. Gardner, 1900–1966)，並以自己指導的日本學方向研究生賴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 協助教學。⁹²

魏魯南是哈佛大學第一個以漢學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的畢業生，在學期間曾赴巴黎隨伯希和深造。他說過一句讓洪業到老不忘的話「伯希和從來不會弄錯的」。⁹³當得知受哈燕社資助的女學者赫夫 (Elizabeth Huff) 打算以黃節的《詩學》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時，魏魯南勸她放棄這個計劃，「因為沒有透徹研究每字每句之前是不可能真正研究這部《詩學》的」，⁹⁴而他本人的博士論文作的是《魏

⁹¹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368–70。此乃陳氏翻譯 Serge Elisséeff, “A Paper Read at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Associated Board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⁹² 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網頁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1930–1940)”。

⁹³ 陳毓賢：《洪業傳》，頁168。

⁹⁴ 李若虹：〈漢學和中國學豈能分立山頭：柯立夫與楊聯陞（下）〉，《文匯學人》，2017年12月1日，「學林」版。

書·釋老志》譯注，部分章節曾在《通報》上發表。賈德納早年在哈佛大學師從趙元任學習中文，二十年代中期赴巴黎大學深造，戰前有過兩次來華訪學的經歷，精於中西目錄之學和漢籍版本，博士論文做的是《清史稿·聖祖本紀》譯注。⁹⁵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對他的評價是思路嚴謹、博聞強識，但不善綜合、概括；賴世和出身於日本東京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和葉理綏一樣對日語和日本文化有過長期的實地接觸，博士論文做的是日本天臺宗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譯注，共有1550條注釋。⁹⁶以上三人的學術出身、研究旨趣乃至博士論文的形式，完全符合葉理綏訂立的歷史語文學標準，而在費正清這樣強調綜合的史家看來，他們只是在為史學大廈製造磚石，一生都在做著史之前的準備工作。

葉理綏的主政哈燕社，尤其是哈佛大學遠東語文系的成立，對致力於匯通中西歷史、科學方法、史學分析與綜合的洪業及燕京大學歷史系構成不小的壓力。為了能順利通過提交給哈燕社理事會的年度財政預算，他們不得不對過往的堅持有所變通甚至作出讓步。首當其衝者，是那些被推薦去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選派生。繼齊思和之後，1935屆碩士畢業生翁獨健成為燕大歷史系第二位哈燕社留美獎學金的獲得者。翁獨健，福建福清人。三歲患小兒麻痺，左腿殘跛。自幼聰穎，讀書勤奮。1928年，以優異成績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入學不久，在陳垣和洪業的影響下，立志為改變中國人文學研究的落後狀況而努力，並選擇蒙元史作為畢生致力的方向，專業之外精勤於英語和日語的學習，獲得洪業的賞識。1932年提交學士論文〈元田制考〉，從十個方面詳考元代田制沿革，展現出流光溢彩的史學才賦。本科畢業後入燕京研究院深造，於1935年提交碩士論文〈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系統論述元代管領各派宗教的機構，糾正前人疏漏訛誤，創獲甚多。為了讓翁獨健順利拿到哈燕社的獎學金，洪業少有地動用了自己的私人關係，煞費苦心地要為燕大史學系儲備一位希望之星。⁹⁷然而，1935年的哈佛大學已是法國漢學搶灘北美陣地的「諾

⁹⁵ 王立：〈不該被忘卻的中美文化使者——美國漢學家賈德納及其中文藏書〉，《中華讀書報》，2019年4月3日，第17版。

⁹⁶ 費正清著，黎鳴、賈玉文等譯，黎鳴校：《費正清自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64、176。此書譯自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⁹⁷ 詳薄音湖：〈翁獨健傳略〉，《蒙古史研究》第2輯（1986年），頁127–28；陳毓賢：《洪業傳》，頁195。

曼底」。翁獨健不再能像齊思和那樣進入對口的歷史系，追隨一位歐洲史或者美國史的巨匠，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考察世界歷史上的蒙元帝國，而是直接受教於遠東語言教授葉理綏並加入稍後成立的遠東語文系。雖然有過追隨伯希和問學的經歷，但葉理綏本人既非蒙元史專家，也不擅長史學意義上的分析與綜合。他所能提示翁獨健的是治蒙元史需掌握哪些必要的語文工具，並強調文本分析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至高性。翁獨健提交的博士論文〈愛薛生平研究〉（“Ai-hsieh: A Study of His Life”），正是這一指導方針下的產物。事實上，這並不是一部關於景教徒愛薛及其所處蒙古汗國時代的綜合性論著，而是以英譯加注釋的方式分析並考訂記載愛薛生平的漢文史料。和此前魏魯南、賈德納和賴世和的博士論文如出一轍，翁文的功力主要體現在注釋中，「有連跨數頁的長注，而且往往是注中有注。除了引用其他史料擴展神道碑敘事的內容以外，還評介各種相關的研究成果」，屬於典型的伯希和研究範式。⁹⁸1938年，經葉理綏、賈德納和魏魯南的評審，翁獨健的論文為遠東語文系學術委員會所接受，他也成為哈佛歷史上首位遠東研究方向的哲學博士。⁹⁹葉理綏對翁獨健的範式轉換顯然頗為滿意，哈燕社破例出資送其赴巴黎隨伯希和進修一年，繼俄文、阿拉伯語和日語之後，學習蒙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等東方語言。¹⁰⁰翁獨健把主要時間都用在掌握語文工具上，而洪業強調的西史方法與視角及分析與綜合具工的史學標準，已無暇兼顧。

1939年，繼翁獨健之後來到哈佛的，是被認為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最有希望繼承陳寅恪衣鉢的燕大歷史系1935級研究生周一良。據周本人的分析，洪業推薦其為哈燕社留美獎學金候選人的目的有三：一、讓歷史系優秀生赴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成為燕京的一種傳統；二、指定具體的研究方向，以便

⁹⁸ 劉元珠：〈翁撰〈愛薛傳研究〉及其他〉，載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8。

⁹⁹ 三位評審姓名的確認，得益於劉元珠教授慷慨惠示其複製的翁先生博士論文封面圖片，在此深表謝意。翁為哈佛首位遠東研究方向哲學博士的記載，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網頁“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1930–1940),” 1938年條。

¹⁰⁰ 翁獨健得哈燕社資助赴巴黎學習的記載，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網頁“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1930–1940),” 1938年條。其在巴黎繼續學習各種古今語言的情況，可參考翁獨健：〈我為甚麼研究元史〉，《文史知識》1985年第3期，頁3–6。

日後安插到國文系；三、借去哈佛深造的機會，把燕京培養的人才從史語所陣營中拉回來。¹⁰¹事實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葉理綏上任之後，哈燕社在將工作重心轉嚮拓展在哈佛本部的教研項目同時，加強了對在華合作大學的監管，在諸如經費使用、教研方針等問題上與後者構成新的緊張關係。¹⁰²為了顧全戰時教研運轉的大局，司徒雷登提議從1938年秋季學期開始，由洪業替換曾經公然反對葉理綏出任社長的博晨光，實際主持北平辦事處工作。博晨光先是赴美休假，繼而於1939年7月徹底退出北平辦事處的決策層。¹⁰³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派出日文修養極好，又對梵文等古典語言感興趣，並曾在中央研究院受過陳寅恪和傅斯年兩位史語巨匠指導的周一良，去師從有日本知識興趣和法國漢學信仰的葉理綏，難免有投其所好藉以緩解緊張關係的深意存焉。不出意料，在哈佛的七年時間（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滯留），周一良的主要精力都用於學習各種活的和死的語言上，梵文、拉丁文、希臘文、日文、德文和法文已經讓他暈頭轉向，西史方法與視角固然無暇兼顧，魏晉南北朝史也束之高閣。和翁獨健一樣，周一良的博士論文是利用梵學知識，研究唐代印度來華的三個密宗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金剛，內容是對贊寧《宋高僧傳》中三家傳記的翻譯，並配以詳細注釋和專題附錄。根據魏魯南的建議，取了一個堂而皇之的題目〈中國的密教〉（“Tantrism in China”），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的第8卷第3/4號（1945年）。正如周氏自己所言，該文所以頗受歐美學界的推重，主要在於為早期密宗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校訂精善的史料基礎，並沒有做到與標題相稱的宏觀綜論，只能算作一篇「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¹⁰⁴取得博士學位後的周一良，成為葉理綏在日語教學方面的左膀右臂，¹⁰⁵而洪業則失去了他在任期間為燕大精心培育的又一名史學英才。

¹⁰¹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28–29。

¹⁰²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49。

¹⁰³ 〈私立燕京大學本科入學簡章（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再版）〉，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YJ1938006；1939年7月6日，博晨光致柯立夫信，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YJ1939007。

¹⁰⁴ 詳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30–34、123。並請參考錢文忠：〈譯後記〉對周著的評價，載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23–24。

¹⁰⁵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39、41。

四、破碎的藍圖

除了要在研究範式上改造昔日的合作夥伴，葉理綏還一度把燕京大學當作哈燕社在中國的「零件代工基地」，而不是其傾力打造的漢學研究中心。編寫一部由哈燕社冠名的漢英大辭典，是葉理綏長社後明確的重要計劃之一。葉理綏看到了對中文工具書的需求，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西方漢學家在閱讀漢籍時至少要取十本傳統中文辭書配合起來使用，給研究帶來極大的不便。葉理綏希望能編纂一部集內容之大成的漢英辭典，按照最優良的西方體例進行編排，並注意吸收中外學界的最新成果。但工程浩大，單是整合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到高本漢的《漢文典（修訂本）》在內的十六部工具書的內容，就要投入大量專業技術人力。此時，他想到了洪業領導的燕大引得編纂團隊。

在1935年1月25日致阿理克的信中，葉理綏寫道：「在未來的3個月裏，北平（燕京大學）洪業教授主持的引得編纂處將為我們工作。《佩文韻府》將被裁剪開來，然後貼到卡片上，還有日本的《字源》。整個工作需要黏貼50萬張卡片。而後這些卡片將被寄到這裏，寄到哈佛，由我們翻譯並尋找準確的注解和出處。」在2月4日的信中他又寫道：「我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這些詞，準確地說是字，進行排列。是按照偏旁部首，還是像翟理斯和巴拉第那樣依照北京話的發音？如果按照發音來歸類，又如何處理詞組和同音字？是像翟理斯那樣顧及漢字的『聲部』，還是按偏旁部首？我想聽到您的意見。對我這個日本學家而言，按北京話抑或按偏旁部首都無所謂，但是，我希望這部辭典能讓漢學家滿意。」信剛發出，他就收到阿理克對其1月來信的答覆。因此2月8日他又回信：「非常感謝您提供的辭典信息（指由阿理克主持編寫的《漢俄大辭典》……）以及漢字排列方法。我已經將經費寄往北京，請求洪教授開始剪貼《佩文韻府》。他領導的引得編纂處的員工習慣了做此類工作，可能會做得很好。您說編這種辭典需要建500萬張卡片，令我多少有些震驚。」一年後的1936年3月3日，葉理綏向阿理克談到了《漢英大辭典》的進展情況：「夏天去北京的魏魯南剛回來，他說在引得編纂處同人的協助下，編寫漢英大辭典的工作已經開始。他們已經開始剪貼《佩文韻府》和日本的《字源》（一個月前我收到北京洪教授的來信，內稱這兩部字典已經剪貼完畢，共用去50萬張卡片。明天〔年〕春天，他們將繼續此項工作）。我想我們需要做大約500萬張卡片。全部資料將寄到這裏，在我的主持下翻譯成英文。這當然是一項大工程，需要大約10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但令我滿意的是，我們已經開始做了。」同年5月22日的信中寫道：「北京那邊編寫辭典的工作還在繼續，當年的經費已經撥付。中國

新出了《辭海》，其中在例句後面標明了書名和篇目，這可以有效提高詞匯釋義的準確度，方便找到那些脫離了上下文難以理解的引文。」¹⁰⁶

據時任引得編纂處副主任的聶崇岐回憶，實際使用到的中文辭書遠不止上述這些。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讓葉理綏更加關注引得編纂處的工作，他不希望辛苦積累的辭典素材毀於戰火，同時認為「不能指望中國人自己在此領域取得進展」。¹⁰⁷所以，即使是北平淪陷後，整個剪貼工作也沒有中斷，而是一直持續到1938年末才大體完工。「這些卡片資料寄到哈佛，由一組中美專家和工作人員進行第二階段工作；這些專家包括著名語言學家李方桂和趙元任」，¹⁰⁸兩人都是中研院史語所的成員。葉理綏曾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盛讚洪業領導的《引得》項目有極高的學術標準，對中國文化研究作出寶貴的貢獻。但透過哈燕社漢英大辭典項目的進展過程，特別是他和阿理克的私人通信，不難看出在葉理綏眼中，洪業及其領導的引得編纂工作不過是剪刀加漿糊的熟練工操作，他根本不認為這樣的團隊有資格參與到更高層面的學術加工階段。燕京人為美國漢學的發展充當了學術苦力的角色，卻得不到學術上的根本提升。他們擱置手上的工作、費時費力製作的幾百萬張卡片，最終也隨著辭典項目的進展無果而打了水漂。¹⁰⁹

充實漢和圖書館的館藏是葉理綏拓展哈燕社在哈佛中心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北平的燕京大學理所當然需為哈燕社代購中文圖書。洪業擔任燕大圖書館委員會主席期間，不但為燕大的圖書建設出力甚多，對哈佛大學的東亞圖書收藏也極有貢獻。他曾把漢和圖書館首任館長裘開明(1898–1977)請到燕大，統一雙方的館藏分類標準。此後，燕京大學在購置中、日、韓文圖書時，照例會替哈佛大學同樣購置一份。如遇善本書，通常會讓給哈佛大學，而只影印一份留存燕大。因為洪業認為哈佛收藏善本的條件優於國內，另外後者也出得起高價。「有研究價值而市上買不到的書，他則千方百計借來影印，一份給燕大，一份給哈佛」。¹¹⁰哈燕社漢和圖書館能在短時間內躍居成為僅次於美國國

¹⁰⁶ 此段內的書信，皆轉引自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頁522–23。

¹⁰⁷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62。
¹⁰⁸ 同前注。

¹⁰⁹ 有關這些卡片的最後收存地點，可參閱陳毓賢：〈蒙古學家柯立夫其人其事〉，《親炙記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26的相關描述。

¹¹⁰ 陳毓賢：《洪業傳》，頁177。

會圖書館的第二大東亞圖書館，離不開洪業及其團隊在中文圖書搜求方面的盡心盡力。¹¹¹

然而，葉理綏並不領情，正如善本書購買力問題暴露出同受霍爾遺產基金資助的哈佛和燕京雙方，實際在經費支配權上嚴重不均。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進一步的分配不均提供了最好的藉口。戰爭期間，哈燕社理事會增加了漢和圖書館的預算，主要用於拓展中文藏書，尤其是地方志和叢書。1938–1939年度，洪業領導的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為漢和圖書館購入普通中文書籍563種8,149冊36幅11部1張134頁，計費華北聯銀券23,877.56元（當時匯率是美金1000 = 聯銀券5,800）；方志439種、4,499冊，計費聯銀券13,911.34元。¹¹²1939–1940年度，購入普通中文書籍833種14,364冊3部1帙185頁，計費聯銀券54,371.74元；方志415種3,655冊，計費聯銀券21,428.02元；拓片1,547種，計費聯銀券5,500元。總共普通書、志書、善本書2,812種18,019冊20部1帙185頁，計費聯銀券84,499.76元。¹¹³而在這兩個年度，燕京大學圖書館從哈燕社理事會獲得的圖書預算只有每年聯銀券10,000元。¹¹⁴對於這種厚薄兩極分化的現象，葉理綏和哈燕社理事會給出的理由是「為甚麼給燕大圖書館投入大量的金錢，等著日軍來燒毀」。¹¹⁵

和圖書經費分配同樣不均的還有教研資助。如前所述，葉理綏於戰前將哈佛大學的中文和日語教學整合起來，「納入了自己擔任系主任的遠東語言系。該系與文理學院其他系享有同等地位」。¹¹⁶但自戰爭開始，它的一切行政、教研開支完全由哈燕社負擔，哈佛大學並不承擔任何財政上的義務。¹¹⁷同時，葉理綏卻對燕京大學使用哈燕社基金資助文、史、哲三系的教研工作嚴加監管，

¹¹¹ 關於洪業與燕京圖書館事，詳參陳毓賢：《洪業傳》，頁176–77；張瑋英、王百強、錢辛波主編：《燕京大學史稿》，頁410；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83–301。

¹¹² 〈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二十七年度 (July 1, 1938–June 30, 1939) 所用書款清冊〉，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38002。

¹¹³ 〈燕大圖書館哈佛購書處二十八年度所購圖籍目錄〉，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39006。

¹¹⁴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eking Office Proposed Budget for 1939–40,” 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39005。

¹¹⁵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61。

¹¹⁶ 同前注。

¹¹⁷ 同前注。

甚至橫加干預。他對戰時燕大用哈燕社的錢去資助多位沒有受過西方教育的傳統中國學者感到不悅，¹¹⁸認為這是對西方研究方法重視不夠所致。他要求司徒雷登把這些人的名字從哈燕社的資助名單中拿掉，以保證教學和科研團隊的高質量。葉理綏提議，哈燕社留美獎學金獲得者、哈佛博士鄭德坤（華西大學）是教授考古學的理想人選；¹¹⁹而相比於連中國的高等教育都沒受過的鄧之誠、張爾田，接受過西方訓練的洪業和齊思和更有資格教授學生史學方法論。¹²⁰為了縮減戰時在中國尤其是淪陷區的投入，葉理綏特別強調分配給燕京大學的哈燕社基金只能用於嚴格意義上的漢學研究領域，不允許旁逸至諸如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甚至連洪業和齊思和最強調的西洋史研究，如不被認為與漢學研究直接相關，同樣得不到哈燕社基金的支持。¹²¹另一方面，哈燕社卻慷慨地資助了戰時由瑞典考古學家秦西（Olov R. T. Janse, 1892–1985）領導的法屬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和菲律賓的田野調查。¹²²秦西的調查地域嚴格來說已經逸出中國考古學的範圍，可能因為他在調查中找到一些顯示中國文明對當地的影響力的文物，而不被認為與哈燕社基金的資助原則相違背。這種標準不一的做法，引起燕大方面的強烈反彈。

1939年，司徒雷登致信葉理綏，表示哈燕社只是受霍爾遺產基金會的委託，代為管理用於促進亞洲高等教育事業的那部分基金，但是沒有任何條文規定錢必須全部用於「漢學研究」。燕大方面對此的理解是，在保持中國人文學教研水準的前提下，可以使用這些基金來加強整個文學院，以保證學科發展的平

¹¹⁸ 燕大的中國人文學教授陣容中，如鄧之誠、張爾田、容庚等都沒有留學西方的經歷。

¹¹⁹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中譯本頁150作「哈燕社獎金獲得者、哈佛博士容庚是教授考古學的理想人選」。事實上，容庚並沒有求學哈佛的經歷，抗戰全面爆發後困處北平。當時真正拿到哈燕社獎金、赴美學習考古並於1941年取得博士學位的是鄭德坤。葉理綏的意思顯然是，哈佛博士鄭德坤比北大畢業沒有接受過西方訓練的容庚，更有資格在燕京大學教授考古學。

¹²⁰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50。

¹²¹ 同前注，頁154。並請參考北京大學檔案館“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eking Office Proposed Budget for 1939–40”；“Miss Hilda L. Hagua to Mr. Wu Wen-tsao, Jan 14, 1938”及“Lucius C. Porter to Dr. R. T. Shields, May 4, 1938,”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YJ1938004。

¹²²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63–64。

衡。因為廣義的「中國研究」，並不限於某個系，而是多少可以拓展到除西方語言之外的所有學科。¹²³然而，抗議的結果是哈燕社理事會推遲審批燕大提交的1939–1940年度預算，¹²⁴在經濟狀況惡劣的淪陷時期，最終還是要由燕大作出妥協。

在哈佛，葉理綏大力培植並拔擢迎合其學術路線的本土新進。當賴世和、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還在讀研究生時，葉理綏就為他們配套了兩年歐洲加三年遠東的海外留學計劃，並著意安排兩人參與到遠東系的教學和哈燕社的社務中(如讓1938–1941年在北平留學的柯立夫，負責整理鋼和泰去世後留在中印研究所的藏書和手稿)，為其畢業後能順理成章地成為遠東系的一員做好鋪墊。

在1942年5月的哈燕社董事會上，葉理綏對柯立夫的高度評價最能說明他的「良苦用心」：「柯立夫通過了資格考試和博士論文答辯。他遞交的博士論文，是有關元朝的蒙古碑文，相當出色。過去一年裏，我們還可以看出柯立夫也是一位深得學生喜歡的好老師。他精通漢文、蒙文、藏文和梵文，是一位非常獨特、富有潛力的學者。柯立夫先生在國外留學足有五年，現年30。為了能使他留校任教，遠東系已投票決定向學社推薦，聘任他為助教，任期為五年。」時值太平洋戰爭，葉理綏特意指出，如柯立夫應徵入伍，現定的五年聘任期便於他退役後即可返校任教。正如論者指出，「柯立夫的學業和教職的進展實在不能再順利了。他6月初才參加了畢業典禮，而到6月29日已經被正式聘為遠東系的助理教授！」¹²⁵事實上，柯立夫所以能深得學生喜愛、精通多種語言、留學海外多年，固然因其個人的天份和努力，更離不開作為幕後推手的葉理綏的精心規劃。以至於為了讓柯立夫的留校符合「程序正義」，不惜由葉理綏主持的遠東系投票決定向葉理綏主政的哈燕社推薦柯立夫為助教人選。

相比之下，燕京大學要培養的史學新進就沒有這種幸運。從齊思和開始到太平洋戰爭前的周一良，如無特殊情況，必須在四年之內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如果拿不到，下一屆獎學金的名額就要給哈燕社在中國的其他合作大學。¹²⁶很

¹²³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54。

¹²⁴ 同前注，頁150。

¹²⁵ 本段至此，引自李若虹：〈「心理東西本自同」：柯立夫與楊聯陞(上)〉，《文匯學人》，2017年11月24日，「學林」版。

¹²⁶ 齊文穎口述：〈齊思和：燕園第一位哈佛博士〉，頁41。

少人可以像賴世和和柯立夫那樣用上六到八年時間做到學問與學位兼得。經濟方面，周一良在哈佛時期的獎學金是每年1,200美元，扣除學費400美元後，所餘基本够用。¹²⁷同一時期，柯立夫在巴黎和北平的獎學金是每年2,000美元，¹²⁸因其同時兼有中印研究所負責人的身份，學費負擔又比周一良輕很多。留學期間的柯立夫，可以動輒為自己購置《清實錄》這樣的大部頭資料書，¹²⁹而周一良卻連一本學梵文用的詞典都要父親從天津寄到哈佛。¹³⁰學習效率方面，哈佛的學生通常能集合留學當地的優勢資源、心無旁騖地投入研究。以柯立夫來說，1936到1938兩個學年，經伯希和的指點，在漢語、蒙文、滿文和藏文方面得到非常扎實的訓練。此外，還跟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閱讀宋、元和清代的史料，跟伯希和學習中國印刷史和《馬可·波羅遊記》，跟馬伯樂學習六朝道教和唐代佛教，選讀《四庫全書》，跟葛蘭言閱讀《後漢書》，跟巴考(Jacques Bacot, 1877–1965)讀九世班禪喇嘛的著作。來到北平後，谷華輔和韓儒林教他漢語文言，同時教他藏文的是一位叫比利可圖的蒙古學者，著名的蒙古學家比利時神父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是他的蒙文導師。在北平期間，柯立夫的學術交流對象主要是和他一樣的歐美漢學家。除了中印研究所的工作，他在燕京大學並不承擔教研任務。¹³¹換句話說，他只為自己和哈燕社美國本部擴充中國方面的研究材料和語文工具，卻不用力提高中國當地的教研水準。

領取哈燕社獎學金的燕大留美學生剛好相反，除非是像翁獨健或周一良那樣主攻四裔民族之學的，大部分以中國文史為研究方向的學生，在漢學還只剛剛起步的哈佛，既得不到漢學大師的指點，也談不上研究材料的擴充，¹³²更沒有機會像美國學生那樣去歐洲或日本深造，還不允許在遠東系以外的系所註冊，「因此當時有些中國同學不無諷刺地稱之為『學中文的』」，¹³³且這種中文還

¹²⁷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34。

¹²⁸ 李若虹：〈「心理東西本自同」：柯立夫與楊聯陞(上)〉。

¹²⁹ William Hung, "Personal Loan to Mr. Francis W. Cleaves from the Contingent Fund, December 20, 1939," 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39007。

¹³⁰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33。

¹³¹ 「以柯立夫來說」至此，引李若虹：〈「心理東西本自同」：柯立夫與楊聯陞(上)〉。

¹³² 周一良1940年11月13日致傅斯年信，載趙和平主編：《周一良全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編第10冊，頁18–19。

¹³³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頁30。

不是為自己學的。1939年開始哈佛博士課程的燕大歷史系畢業生鄧嗣禹在給洪業的信中描述，他和鄭德坤等中國學生被規定每年都要選修同一門漢語課程，直到不再領取哈燕社的獎學金為止。他們修讀這種以漢譯英為主要內容的課程，相當於美國學生的漢文「陪練」，而當中國學生提出請同樣領取哈燕社獎學金的美國學生為他們的英譯作修飾時，卻沒有人願意做這種互惠的學伴。結果就是，考試的時候四名中國「陪練」往往只能得 B+，一名美國學生卻得到葉理綏和魏魯南給的 A。在漢語這種遠東系的主要課程上得 B 等，對領取哈燕社獎學金的中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難堪的。這種陪練別人、自己卻無所提高的學習讓鄧嗣禹看不到希望，他在給洪業的信中表示，自己根本不在乎那個為大多數中國同學所看重的博士學位。¹³⁴

洪業沒有想到，自己的以退為進換來的是燕大中國人文學建設藍圖的全面告急。匯通中西歷史、科學方法、史學分析與綜合的教研方針受到葉理綏粗暴的干涉；派去哈佛深造的人才梯隊被葉理綏變相改造；隨著戰事的推進，哈燕社削減燕大預算的理由越來越充份。更可怕的是，在燕京為哈佛代工、中國史學為美國漢學作陪練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因看不到希望而喪失奪回漢學中心的鬥志。先前一直與葉理綏合作的洪業，至此已退無可退。在致鄧嗣禹的回信中，他提出一個醞釀已久的大膽構想：

既然博士學業為眾多出國深造的中國學生所看重，我現在要考慮以燕京大學目前所掌握的資源，如果花上幾年時間籌建出一個博士學科點是否為一項明智的舉措。至少在諸如中國歷史、漢語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藝術等領域較易實現這一點。我曾就此與司徒雷登校長、研究生院院長陸志韋教授有過初步溝通，至少就願景層面而言他們表示出相當的興趣。但目前尚在內部醞釀階段，所以請不要對外聲張。

與此同時，我們首先想研究一下西方院校最好的博士學科點都需具備哪些條件，我們要使之契合中國的學科和這裏的國情。以哈佛來說，我們的辦公室裏雖有大量的哈佛大學專業目錄，但內中沒有向上述專業的博士資格候選人說明博士課業要求的具體細節。如果你去哈佛大廳，你會在樓下看到很多院系的簡報，裏面有大量關

¹³⁴ “Ssu-yü Teng to William Hung, Sept 6, 1939,” 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39007。

於博士課業要求的細節。等你有空的時候，能否去翻閱一下，並揀出一些寄給我。我相信這將大有助於我們的事業。¹³⁵

所以說這是大膽的構想，因為在此之前中國還沒有成功地培養出一名博士。¹³⁶ 洪業當然不會認為燕大已經有能力開展博士教育，更何況還是在戰時淪陷的逆境中，但放手一試也許是改變與葉理綏交涉時處處被動的不利局面的唯一出路。哈佛大學所以能在霍爾遺產基金資助的中美學術合作項目中佔盡優勢，無非因為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更為成功，尤其是擁有當時的中國尚無法對等的博士學科點。雖然就漢學研究水平而言未必高過燕京，但哈佛可以授予包含漢學在內的遠東研究方向的哲學博士學位，這在當時既是一種專業史家資質的認證，更代表著一種前沿的科研技術標準。只要一天還有賴哈佛提供這種專業資質認證和科研技術標準，燕京大學就無法在經濟上、學術上，甚至行政上實現真正的獨立，代之以在隨哈佛起舞的過程中消耗自己、一無所成，這就是洪業知其大膽卻又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借著葉理綏要燕大拿出一份戰時科研規劃的機

¹³⁵ “William Hung to Ssu-yü Teng, Oct 11, 1939,” 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39011：

Since the Ph.D. business is of such importance to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going abroad, I have now begun to think whether it would not be after all a wise policy for Yenching University to begin planning for such Ph.D. work as its resources may support, say after a few years of preparation. At least, it is easier to argue for the setting up of Ph.D.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such Chinese subjects as history, philology, literature, philosophy, art, etc. I have tentatively talked over the matter with President Stuart and Professor C. W. Luh, Dean of our Graduate School. They seem to be quite interested in at least thinking about future plans. The matter has not yet gone beyond the confidential stage, therefore please keep this intelligence to yourself.

In the meantime we need first of all to study the best Ph.D. requirements in a number of the Western institutions, and to adapt them to our Chinese discipline and local conditions. As for Harvard, I found that the bulky volume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atalogue which we have in the office here yields not sufficiently detailed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Ph.D. work in the several subjects that are open for Ph.D. candidacy. If you go to the University Hall you will find downstairs quite a number of departmental bulletins which give in great detail the Ph.D. requirements. When you have time, would you be so good as to go over them and select a few and have them sent to me. I believe they will be of help.

¹³⁶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77。陳著頁273，交待中國還沒有培養出一名博士的背景。

會，洪業於1940年起草了一份長達27頁的〈哈佛燕京學社五年計劃建議稿——有關燕京大學研究生教學與研究〉，旨在將燕京大學打造為第一所授予人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高校：

我們假設博士研究生工作可以在中國研究的七個領域展開，語言、文學、藝術、考古、歷史、哲學、宗教，這些領域可以分成四個研究生部：文學部、藝術和考古部、歷史部、哲學和宗教部。我們大致估計，這些部至少有12–15個教授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預算資助。……在12–15個教授中，我們將在1940–1941年增加的四人是翁獨健（哈佛博士）、高名凱（法國博士）、王靜如〔留學法國〕、于道泉（於英國大學亞非學院教書）。燕京大學齊思和1935年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¹³⁷

洪業認為由這12–15位教授在七個領域和四個學部之間的合理分工，可以逐步解決博士學科點的師資問題，畢竟有五年時間來推進這一工作。他特別強調歷史學比其他學科更具備提供博士生教育的條件，雖然顧頡剛已經離開了三年，但齊思和已經返回燕京，並將擔任歷史系主任，等翁獨健到任後（其時尚在雲南作調查研究），歷史學的研究工作將大大加強。¹³⁸

我相信，經過三到五年加強我們的教學力量和研究設備，我們應該可以進行一些後研究生項目，這些項目將達到英國、歐洲、美國的最高研究水平。我們在古典研究、藝術、文學，可能還有中國公共事務方面，尤其具有這樣的機會。中國教育部還沒有制定授予博士學位的規章制度，有關碩士學位的規定就是以我們〔燕大〕的實踐為基礎制定出來的。¹³⁹

洪業認為，哈佛大學可以在麻省劍橋培養一些博士，但燕大的博士培養以後都依靠哈佛大學來培養並不可行，這其中有經濟的原因，比如中美的生活和教育成本差別較大；也有教育發展的原因，自己的教育終究要靠自己來發展。¹⁴⁰

¹³⁷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79。陳滔娜翻譯洪業“Suggestions for 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ive Years Plan for Graduat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Yenching University, 1940,” 聯董檔案號：315-4823-0717-0744。

¹³⁸ 此段敘述，採自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79。

¹³⁹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78。陳滔娜翻譯洪業“Suggestions for 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ive Years Plan”。

¹⁴⁰ 此段引自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78。

我們認為，經過五年的連續準備之後，哈佛燕京學社在中國的活動應該可以支撐燕京大學在中國方面進行博士學位授予的工作。這是我們的目標。¹⁴¹

葉理綏本以為燕大會拿出一份更為保守的戰時計劃，「按照學科重組現有項目，提高效率；並不是所有院系都需要加強和改變管理，所以沒有必要大幅增加教學人員，何況燕大的研究生並不多」，¹⁴²卻沒想到洪業的計劃遠比自己預計的更為「野心勃勃」，且表面看來又不與葉理綏的意志相違背：既然要重點發展漢學研究，那麼在漢學科目中建立博士培養制度就沒有甚麼不對；而要建立博士學科點，勢必就要增加教學人員，研究生數量也會增多，向哈燕社爭取更多的經費預算也就理所當然。何況，洪業啓用的不是哈佛博士就是巴黎學派嫡系，完全符合葉理綏的門第論和方法論。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燕京對自己的中國人文學研究傳統有自信，同時也願意對葉理綏的史語路線敞開胸懷；只要拿到霍爾基金中本該屬於自己的份額，燕京並不想在人才培養的問題上完全靠在哈佛身上。在1940年11月的理事會上，經與洪業本人討論後，葉理綏和理事會很不情願地批准了該計劃，並提出進一步修改的建議。葉理綏認為，既然燕大有意開展自己的博士生項目，今後也不必將中國學生或學者全部送到哈佛進修，「應該由燕大而不是哈燕社來承擔如此宏大計劃的絕大部分開銷」。¹⁴³換句話說，哈燕社無意成全燕大借博士學科點的創立以實現財務自主的願望。不管哈佛方面是多麼的不甘心，洪業的放手一搏總算是取得了初步的進展。

1941–1942學年是燕大的博士學科建設進入準備期的第一年。該學年的歷史系和國文系課表給人以氣象一新的觀感。翁獨健一口氣為本科生和研究班開出「亞洲史概論」、「回教史」、「蒙古歷史語言研究」、「中亞史研究」等四門全新課程，融史語考證於宏觀綜論中。齊思和出掌歷史系後，西洋史的地位從一般的教學科目拔高到與中國史並重的研究科目，通過「史學方法與輔助科學」課程組的設計，將古今中西歷史共冶一爐；燕大史學的新老交接也在不動聲色中進行，翁獨健從恩師洪業手中接過「遠東近代史」課程，並和聶崇岐一道「收復」

¹⁴¹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頁278。陳滔娜翻譯洪業“Suggestions for 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ive Years Plan”。

¹⁴² 樊書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151。

¹⁴³ 同前注，頁151–52。

了由輔仁教授張星烺把持了逾十年之久的「宋遼金元史」課。齊思和將顧頡剛留下的「中國上古史」拆分為「殷周史」、「春秋史」和「戰國史」，作更系統的講授，並替老師洪業分擔了「中西歷史研究法」等高階課程。侯仁之填補了譚其驤走後歷史地理教學的空白，在傳統沿革地理的基礎上提升了與現實關係更緊密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比重。王鍾翰和聶崇岐也分別以「清代政治史」和「中國官制史」的課程，在鄧之誠的基礎上對歷代典章制度沿革作更具體的闡發。留法師從馬伯樂的高名凱在國文系講授「語言學概要」和「中國文法研究」，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說明漢藏語文法之系統。伯希和的高足王靜如則開設「聲韻學概要」、「聲韻學史」、「古韻研究」和「等韻源流」等課程，通過介紹高本漢等西方學者的古音構擬方案以為傳統漢語音韻研究之借鑒。¹⁴⁴ 凡此，都是洪業為在燕京大學打造國際一流中國人文學研究中心播撒的學術種子。當燕大的中國人文學研究即將站上一個更高的發展平臺時，作為總設計師的洪業也迎來了桃李芬芳的收穫季節。然而，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被強行關閉，粉碎了一切美好的願景。日本把美國拖入世界大戰，卻無意中成全了心有不甘的葉理綏和嗷嗷待哺的美國東亞學，洪業的五年規劃不出意料地被中止。繼抗戰爆發之後，中國學人要與法國和日本的漢學一爭高下的努力，再次遭遇嚴酷的挫折。

結語

從1923年陳垣在北大國學門懇親會上正式提出要把漢學中心奪回北京，到1928年傅斯年在史語所工作旨趣中提出「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¹⁴⁵ 中國學人在尋求史學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把西方漢學作為科學化的標尺，前進路上的假想敵。以伯希和為代表的歐洲史語學派漢學家，以其廣博的歷史視野和精湛的語文知識，為中國學人提示了研究歷史的新工具、新材料和新問題，讓中國史學取得了「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¹⁴⁶ 不過，生機與危機總是相生相伴。西方漢學為摸索前行的中國新史學開啓了無數扇亮窗，也讓相當一部分人士流連於窗外風景，忘卻了回廊盡頭還有最根本的史學之門待入。於是，新史學變成了「新漢學」，「新漢學家」們研究的多為冷僻窄狹、瑣碎而無關宏旨的

¹⁴⁴ 〈燕京大學課程一覽（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一日出版）1941.9–1942.6〉，北京大學檔案館，檔號 YJ1940014。

¹⁴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12。

¹⁴⁶ 同前注，頁6。

問題，不是真正意義上記述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文化全貌的「史學」。他們的工作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是替真正的史家搜集資料、確定事實，可以算作史學的一門工具學科，卻絕不等於史學本身。¹⁴⁷曾經用以發達中國史學的西方漢學，至此成為限制中國史學取得進一步格局提升的瓶頸。以洪業為代表的燕京歷史學人很早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試圖打破這一瓶頸，本著以漢學方法豐富治史工具、以史學眼光提升漢學格局的理念，讓史學真正成為一門足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鼎足而立的自主科學，而不只是科學的應用之學、史學的輔助學科。在此過程中，他們與在歐洲大陸日漸式微卻又以「東亞學」的面目在北美地區謀求復興的「伯希和學派」產生了理念與利益之爭。洪業何其不幸，當他躊躇滿志要在燕京大學打造國際一流的中國人文學研究中心時，偏逢跨國合作對象有意在哈佛大學建設國際一流的東亞學研究中心，主其事者又是一個在研究方法上沒有多少中國認同的法國漢學（伯希和一派）的忠實信徒。一方面是要掙脫西方漢學「技術至上主義」的傾向，早日回歸歷史大主題，一方面又因為在諸如學術資質認證、科研經費來源等問題上無法徹底擺脫對西方漢學的依賴而步履維艱。最終，隨著日本發起太平洋戰爭、燕京大學被強行關閉而功敗垂成。

¹⁴⁷ 齊思和：〈現代中國史學評論——掌故派與社會學派〉，載李孝遷編校：《中國現代史學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237-42。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北京大學檔案館藏「燕京大學檔案」

二、專書

-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王鍾翰著、諸同學整理：《王鍾翰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 尚小明：《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倉田保雄：《エリセーエフの生涯：日本学の始祖》，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
- 桑 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張瑋英、王百強、錢辛波主編：《燕京大學史稿》，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9年。
- 陳建守：《燕京大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1919-195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
- 陳毓賢：《洪業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陳滔娜：《哈佛燕京學社校際合作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
- 陳 遠：《消逝的燕京》，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
- 菲利普·弗朗德蘭著、一梧譯：《伯希和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 費正清著，黎鳴、賈玉文等譯，黎鳴校：《費正清自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詹姆斯·哈威·魯濱孫著、齊思和等譯：《新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
- 趙和平主編：《周一良全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編第10冊。

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栾明香校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訂本。

錢 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51冊。

Fairbank, John King.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Fan, Shuhua.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Cultural Engineering: Remaking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1924–1951*.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三、論文

丹尼斯·賽諾著、羅新譯：〈懷念伯希和(1878–1945)〉，載丹尼斯·塞諾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賽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02–15。

王 立：〈不該被忘卻的中美文化使者——美國漢學家賈德納及其中文藏書〉，《中華讀書報》，2019年04月03日，第17版。

王伊同：〈先師洪煨蓮先生(1893–1980)傳略〉，《王伊同論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上册，頁391–98。

王鍾翰、翁獨健、劉子健：〈洪煨蓮先生傳略〉，載王鍾翰著，《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461–69。

羽田明：〈エリセエフ教授を悼む〉，《東方学》第51輯，1976年，頁134–37。

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頁453–92。

忻 平：〈治史須重考據，科學人文並重——南加利福尼亞州何炳棣教授訪問記〉，《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1期，頁100–104。

李若虹：〈「心理東西本自同」：柯立夫與楊聯陞(上)〉，《文匯學人》，2017年11月24日，「學林」版。

——：〈漢學和中國學豈能分立山頭：柯立夫與楊聯陞(下)〉，《文匯學人》，2017年12月1日，「學林」版。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斷代」史——民國時期大學「中國通史」講授體系之演變〉，《史學集刊》2011年第1期，頁56–68。

洪 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23–89。

- ：〈歷史在近代學術中之位置〉，《洪業論學集》，頁193-96。
- 胡適：〈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獨立評論》第108期，1934年7月8日，頁2-5。
- 翁獨健：〈我為甚麼研究元史〉，《文史知識》1985年第3期，頁3-6。
- 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載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頁269-71。
- 陳毓賢：〈蒙古學家柯立夫其人其事〉，《親炙記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16-26。
- 陳鴻舜：〈法國銘文學院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之茹理安獎金 (Prix Stanislas Julien)〉，《燕京學報》第23期，1938年，頁292-312。
- 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大公報 (天津)》，1935年2月19、21日，第4版。
-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卷，頁3-12。
- 楊劍：〈齊思和的中國史博士論文與哈佛大學的美國史學術傳統〉，《史學史研究》2019年第1期，頁42-51。
- 楊堃：〈葛蘭言研究導論〉，《社會學與民俗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頁107-41。
- 榎一雄：〈三人の日本学者の逝去—エリセーエフ・ムッチヨリ・アゲノーエル〉，《東洋學報》第59卷第3・4號，1978年，頁370-84。
- 齊文心：〈先父齊思和生平及著作簡述〉，《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頁293-306。
- 齊思和：〈史學年報十年來之回顧〉，《史學年報》第2卷第5期，1938年，頁543-44。
- ：〈現代中國史學評論——掌故派與社會學派〉，載李孝遷編校：《中國現代史學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237-42。
- 劉子健：〈洪業先生——少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歷史月刊》第17期，1989年，頁77-80。
- 劉元珠：〈翁撰〈愛薛傳研究〉及其他〉，載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5-19。
- 劉選民：〈本刊的內容〉，《史學消息》第1卷第1期，1936年，頁2-3。
- 蔣廷黻：〈歷史學系〉，《清華暑期周刊》1932年第2/3期，頁17-18。

- ：〈歷史學系的概況〉，《清華周刊》第35卷第11/12期，1931年，頁50-52。
- 錢文忠：〈譯後記〉，載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22-25。
- 閻國棟：〈俄國流亡學者與哈佛燕京學社 —— 讀葉理綏俄文日記與書信〉，載朱政惠、崔丕主編：《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頁514-28。
- 薄音湖：〈翁獨健傳略〉，《蒙古史研究》第2輯，1986年，頁127-28。
- Reischauer, Edwin O. "Serge Elisséeff."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1/2 (Jun. 1957): 1-35.
- Sinor, Denis.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 3 (Jul.-Sep. 1999): 467-72.

四、網絡資料

-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1930-1940),"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ealc.fas.harvard.edu/1930-1940> (發布日期：不詳；讀取日期：2021年11月20日)。

漢學與史學的相生相剋

——太平洋戰爭前的洪業及其未竟的學術藍圖

(提要)

林 磊

本文以洪業主導的新史學「燕京學派」和葉理綏主持的哈佛燕京學社美國總部在戰時的跨國學術合作例，考察一度以法國漢學科學標尺的中國新史學，是否可能突破史語考證的方法瓶頸，讓史學真正成為一門足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鼎足而立的自主科學，而不只是科學的應用之學（即將研究自然現象的科學方法簡單地施用於人文及社會現象的研究）、史學的輔助學科。這種瓶頸與突破間的緊張在太平洋兩岸的具體表現，就是渴望擺脫技術至上主義路綫而回歸歷史大主題的中國新史學與在歐洲大陸日漸式微，卻又以「東亞學」的面目在北美謀求復興的「伯希和學派」之間的理念與利益之爭。

關鍵詞： 洪業 葉理綏 伯希和 哈燕社 「五年計劃」

Mutual Promotion and Restraint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Sinology: William Hung's Unfulfilled Academic Blueprint in Occupied Beiping

(Abstract)

LIN Lei

This paper uses the trans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William Hung's "Yenching School" of the Chinese "New History"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irected by Serge Elisséeff as an entry point to examine if it is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New History" to break the methodological bottleneck set by French Sinolog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make historiography truly a science that can stand on its feet alongside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ts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are the conflicts of ideas and interests between the Chinese historians, who were eager to break away from the approach of skill-priority and return to the principal themes of history, and the "Paul Pelliot School" which was losing ground in Europe and seeking a rev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East Asian Studies."

Keywords: William Hung Serge Elisséeff Paul Pelliot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ive-year plan"